

邓小平

A portrait of Deng Xiaoping, the fourth lea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ositione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over. He is wearing a dark, high-collared jacket and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left.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warm, orange-red gradient with a faint image of a bridge and a sun or moon in the upper left.

中国名人传记文学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邓小平

宋毅军 著

前 言

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杰出人物。20 世纪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民主富强新中国的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为民族兴盛、国家富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后代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为了弘扬中华名人的业绩和风范，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组织编纂了《中华名人丛书》。这套丛书以“图文并茂、篇幅精短”为特点，面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初步计划出版 100 本，每本介绍一人，文字限于 10 万字左右，照片 100 幅。首批 20 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昆仑出版社分别在 1998 年年内出版。

在这套丛书编纂过程中，得到有关方面专家、学者、出版单位和一些传记、画册原作者以及传主亲属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华名人协会

《中华名人丛书》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荣高棠 张黎群

顾问：（按姓氏笔划为序）

李 新 金冲及 逢先知 姜思毅
龚育之 崔乃夫 蔡 诚

主 编：李维民

副 主 编：范传新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连儒 王 焰 冯 蕙 阮家新
刘增新 李海文 李海燕 吴殿尧
邱永生 沈学明 张 麟 张瀛丹
陈立人 范 硕 周均伦 周学之
郭可瑛 黄 瑶 萧超然 阎景堂
彭 红 谭德山

目 录

广安大地育伟人	1
探求救国之路	3
把一生交给党	5
在地下工作战线上	7
发动百色起义	9
长征前后	11
奔赴抗日前线	14
就任一二九师政委	16
革命伴侣	18
亲临前线指挥磁武涉林战役	20
百团大战	22
主持温村会议	23
重任在肩	24
军政兼施 上兵伐谋	26
提高警惕 自卫反击	28
拉开战略进攻序幕	30
千里跃进大别山	31
胸怀全局 勇挑重担	33
严格落实各项政策	34
从豫南到豫西	36

决战前夕	37
攻歼黄维集团	38
参加中央九月会议	40
挥师百万渡大江	41
出奇制胜	44
主政西南	46
长期共事 相知甚深	47
到中央工作之初	49
从八大到七千人大会	51
在曲折中发展	53
艰难的抗争	55
在南昌“劳动改造”	57
第二次复出	59
进行全面整顿	61
风雨同舟共患难	64
痛悼周恩来	66
第三次“沉落”与复出	67
坚决反对“两个凡是”	70
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72
在历史的伟大转折中	74
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77
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80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82
必须大力发展高科技	85
在科技工作者中间	87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89
教育要三个面向	92
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94
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96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103
百万大裁军	105
改革的突破口	107
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	110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12
对外政策两个战略性转变	114
冷静观察沉着应付	117
情注祖国统一	118
“一国两制”构想	120
澳门问题达成谅解	123
从小康达到中等国家发展水平	125
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	127
关心文体事业	129
和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在一起	131
创办经济特区和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13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38
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140
这是一个战略安排	142
带头建立退休制度	144
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147
视察南方	149

倡导全民义务植树	153
生活情趣	154
在大海中永生	157

广安大地育伟人

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 70 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

邓小平的故乡四川省广安县位于重庆以北 300 里，以前不通火车，靠船作交通工具。县城主要街道长不过一华里，宽不过五米。邓小平出生、居住地在县城北七里的协兴乡牌坊村，故居称为“邓家老院子”。他的父亲邓绍昌，母亲是广安县望溪乡人，姓淡。

“邓家老院子”一共是 16 间，邓小平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人历经数十年修成一个三合院。和别的农舍差不多，这房子也是白灰抹的墙，木头搭的门，青瓦盖的顶，一排正房略高一点，两边的偏房各有数间，左中右面的中间是一个平坎。

1904 年 8 月 22 日（农历 7 月 12 日），邓小平就诞生在牌坊村一张具有四川民间特色的紫色雕花木床上。他原名邓先圣，5 岁进私塾发蒙，取学名邓希贤，后转入新式小学。高小毕业后，

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 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时他有了朴素的“工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他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了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的活动。

探求救国之路

1920年8月27日，刚刚过完16岁生日的邓小平，和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的其他82名川东子弟，告别家乡离开重庆，9月11日，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开始了前往异国他乡的远航。历时39天，终于在10月19日到达法国南部城市马塞。

首次出国远航的印象肯定相当深刻。

邓小平虽然没有诗情画意地抒发当时的感受，但是，50多年后，他多次谈自己当时乘坐的就是“几万吨轮”。

法国城市特别是巴黎的繁华、气派，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和旧中国的贫穷落后，腐化不堪，在这些青年学生的心理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邓小平也是带着这种反差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活。

邓小平曾经告诉自己的女儿，在当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我是那一批八十几个人里面最小的，连发言权都没有。”

邓小平的第一个做工之处是法国南部重工业城市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工种”是轧钢车间的轧钢工，进厂注册日期是1921年4月2日，编号是07396。76年以后，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将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使用过的工作证件亲手交给江泽民同志。并说：“我仔细寻找过施奈德工厂的档案。”

可以想象，轧钢工的劳动强度极大，而且十分危险，工时又很长，这对于不满17周岁，身材矮小的邓小平来说，是多么不

堪重负呵！然而，做的是苦工，挣得的工资却十分低廉，显然，温饱还是解决不了。后来，邓小平在谈起这二十多天的轧钢工生活时说：在克鲁梭拉红铁，作了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一百多法郎。

1921年3月3日拍摄的这张照片，是迄今为止搜集到的邓小平最早的照片，我们从留影中看到：他虽然穿西服，扎领带，却仍然是一个身材不高，脸上挂着学生气的青年。

把一生交给党

邓小平曾明确地讲：我从18岁就加入革命队伍。这指的是他1922年夏季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7月，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曾深有感慨地对自己子女们说：“我们那时候生活很苦，职业化以后生活来源是公家，但只能吃点面包、煮点面条。我们那时候的人不搞终身制，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的观念。比如说，在法国赵世炎比周恩来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低，但回国以后陈延年的职务最高。陈延年确实能干，他反对他的老子（陈独秀），见解也比别人高，他的牺牲很可惜。赵世炎回国后工作在他们之下，并不在乎。大家都不在乎地位，没有那些观念，就是干革命。这是早期共产党员的特点。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

邓小平入党的当月，同奉调回国的周恩来等人在巴黎合影留念。

1926年1月，邓小平离开法国前往苏联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6月16日中山大学内中共党支部的“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这样介绍邓小平的情况：

“姓名：邓希贤。俄文名：多佐罗夫。学生证号码：233。党的工作：本班党组书记。一切行动是否合于党员的身份：一切行

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否：守纪律。”

“对于党的实际问题及其他一般政治问题的了解和兴趣如何，在组会中是否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提议各种问题讨论，是否激动同志们讨论一切问题：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

“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与否：从无缺席。党指定的工作是否执行：能切实执行。对同志的关系如何：密切。对功课有无兴趣：很有兴趣。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党的进步方面：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无非党的倾向。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在国民党中是否消灭党的面目：未。在国民党中是否能适合实行党的意见：能。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在地下工作战线上

1926 年底至 1927 年 2 月，邓小平倍尝艰辛由苏联回国，到西安冯玉祥国民联军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从 2 月到西安至 6 月离开，短短 4 个月时间，邓小平等中共党员们做了大量工作。邓小平后来回忆：“这个学校是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在中央苏区牺牲），我同时担任校党的书记。”

“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 1928 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

1927 年 4 月，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邓小平从西安来到武汉，8 月 7 日，他以中央秘书身份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纠正和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关于自己与会情况，邓小平记得很清楚：“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

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那个时候我是中央的秘书，是政治秘书。八七会议的时候，我们住在武昌，……会议是号召搞全国起义，全国到处起来，从八一就开始了。”53年后，邓小平又为这次会议的纪念馆题词“八七会议会址”。

自从1928年任中央秘书长以后，邓小平随同周恩来经常出入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被称为“中央办公厅”），主要负责处理机关的日常工作。“中央各部分、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属于机关事务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小平同志作为秘书长进行处理解决。”

据有人回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管开会的议程，头一天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所以经常出入1928年11月至1931年4月间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点——上海闹市中心四马路（福州路）无蟾舞台后面的447号。会议上，他负责记录，但也有权提出问题。他“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份量。他虽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会议过后，他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工作。所以，他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当时，邓小平装扮成有钱人，有时穿长袍、戴礼帽。他还在上海五马路清河坊开了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作为职业掩护。他当过古董店老板。可以说，他相当熟悉上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特别是秘密机关所在的那种四通八达的弄堂。但是，做地下工作的三年多期间内，他“没照过像，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发动百色起义

1929年夏天，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去做广西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相机发展中共领导下的政治军事力量。他化名邓斌，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因为，他是由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相，省绥靖司令李明瑞请来的客人。

邓小平刚到广西南宁，就住在中山路“广昌号汽灯店”。在此，他同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取得联系，并把这个汽灯店作为他的秘密工作站。他认为：“中央派我去广西，就是去做统战工作。我们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

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于1929年12月11日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举行百色起义，建立中国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接着，在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右江苏维埃，雷经天任主席。这次起义，由于准备工作比较充分，争取到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参加，并团结当地各民族与农军相结合，从而取得了胜利。一些老同志回忆时说：“小平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找同志谈话、开会、布置工作。晚上则与张云

逸等首长在一起商讨大计、运筹起义事宜。”

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随后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王逸任主席。3月下旬，邓小平来到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韦拔群的住处，一面设法同红七军主力取得联系，一方面和韦拔群一起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短短的四个多月中，红军发展到七千多人，红色区域扩展到二十多个县，拥有一百多万人口，成为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用邓小平的话讲，这是“红七军的极盛时期”。

长征前后

1931年夏，邓小平从上海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因为他坚持从实际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而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政治生涯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理。后来，在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

邓小平自1933年8月初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担任《红星》主编、中央秘书长，共主编了70多期《红星》报。把这张报纸办得有声有色，他既是主编，又是作者，有时还担负刻写、油印工作。

1934年10月，邓小平率《红星》报人员随军委纵队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艰苦转战途中，他带领工作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继续编辑出版《红星》报，及时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及军委有关作战行动计划与部署，宣传红军将士的感人事迹，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宗旨与任务。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结束了错误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

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

作为会议的亲历者，邓小平后来回忆说：那时也是第二次当中央秘书长。遵义会议时我坐在会议室的一角，临窗的这一角。会后和毛主席、张闻天一起长征。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在挫败了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危害党中央企图，率中央红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陕北，宣告中央红军为时一年的长征结束。邓小平和其他同志一样非常高兴：长征一年没有个家，这回可算到家了。一个月后，邓小平在直罗镇战役中遇险。当时，他和罗荣桓在一个山头上，突然遭到一股敌人的偷袭，危急关头，红军一个连冲上来才解了围。他认为，直罗镇战役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争取东北军，而且更在于打开了通向陕北根据地的通道，在战斗中与陕北的红十五军团会师。也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形成。

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邓小平1972年回忆说：自己只是“跟着走！”“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4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今天我还在用。”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事变。刚刚会师后的红军主力，应邀于12月15日开始，相继紧急出动，由环县地区取直径南下，进至西安附近，准备配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共同抗击挑动内战、由潼关东进的亲日派指挥的国民党军队。

此时，邓小平正处在重病中。12月12日，他被提升为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12月25日，南下红军主力进至甘肃庆阳。

1937年1月4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再次命令红军主力南下。1月8日、9日，红军主力迅速进至陕西泾阳、三原地区，靠近西安城，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组成三位一体，实行军事战略防御。由于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2月初，红军主力奉命由泾阳、三原地区顺南下之路北撤，至宁县、淳化地区。邓小平所在的红一军团政治部则驻扎在甘肃宁县宫河镇王家楼（一说是王录村）。几个月后，他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

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实行合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部。邓小平担任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9月5日，八路军总部在泾阳县云阳镇大操场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大会由邓小平主持，朱德宣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任弼时宣布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6日，邓小平与朱德、任弼时等即率八路军总部出发，开赴抗日前线。

东渡黄河不久，山西成立了带有战时政权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续范亭，邓小平为八路军代表。

在此期间，33岁的邓小平在组织八路军干部宣传抗日、组织武装群众、培养干部、开展游击战、创建根据地等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邓小平在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期间，作过不少的讲话，其中有一篇名为《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可谓其代表作。它成为八九十年代编辑的《邓小平文选》三卷本的开卷篇。当时，全面抗战刚开始不久，邓小平就在文章中开门见山指出：“战争的最后胜败，要在持久抗战中去解决”。文章着重要求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要从政治上保证新战士具有最高度的热情和自觉性开赴前线，使昨天

还是一个有浓厚家庭观念的老百姓，很快成为军队中的熟练战士。这篇文章写于1938年1月12日，刊载于1938年2月12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第三、第四期合刊上。

就任一二九师政委

1938年1月，邓小平来到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月20日，出席在辽县召开的师政治工作会议，并作讲话；27日，他和开完会议返回师部的师长刘伯承会面；2月1日，在师部与刘伯承、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商谈三八六旅干部重新分配的情况；4日，在全师高干会议上传达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精神及中共北方局会议精神；6日，主持召开全师团以上干部会议；20日，和师参谋长倪志亮、中共晋冀豫省委负责人李雪峰等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日军占领上党等地区后我方的应急措施；21日，和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指挥师主力发起长生口战斗；25日，和徐向前在辽县拐儿村，参加八路军总部召集的会议；27日，返回西河头村。

1938年3月1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等拟定神头岭伏击日军作战计划；中旬，和倪志亮在西河头村，参加并指导中共冀豫晋省委关于建立太行山根据地会议；中下旬，和刘伯承、徐向前研究敌情，决定在邯长大道上再打一次仗，袭击日军运输线，以牵制日军向晋南、晋西的进攻。31日，和徐向前指挥部队发起响堂铺战斗。4月6日，在辽县整顿地方武装，准备粉碎敌人的“进剿”；8日，与倪志亮在山西和顺县进行战前准备工作动员，并致电刘、徐通报准备情况；9日，和倪志亮赶到黎城县西井镇参加师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军事计划；11日晚，由和顺

县赶回辽县桐峪镇，与刘、徐商谈反“围攻”准备；16日，和刘伯承、徐向前指挥部队发起长乐村（山西武乡境内仙）急袭战，取得胜利；22日，和刘伯承等率师部返回西河头村。

1938年7月份，邓小平又到冀南去检查工作，在河北省南宫县，邓小平同美国大使馆武官埃文斯·卡尔逊有一次令后者终生难忘的会面。当时，这位武官已同徐向前会了面，见到邓小平时，发现他虽然个子不高，但头脑却像“芥菜一样辛辣”。当交谈中邓小平说美国政府把废钢铁卖给日本政府时，认真的卡尔逊回国后果真去查阅了有关资料，确认邓小平讲话的真实性。不久，他认认真真地研究起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撰写出《中国的双星》一书。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被外国出版物介绍到西方。书中还介绍了邓小平当时向卡尔逊讲述的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谈话后不久，卡尔逊来到抗日根据地考察，证明了邓小平介绍的情况也是真实的。

革命伴侣

1938年8月下旬，邓小平和彭德怀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是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次到延安。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战略规划。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受到批评，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略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取得了完全胜利。会议从9月开到11月，最终通过了决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路线。

这次全会期间，出席会议代表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合影背景是全会会场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合影人员一共有49人。邓小平坐在台阶上，居第三排、两侧分别是彭真和高文华。

1939年8月，邓小平第二次来到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是在这次回延安之后，他结识了卓琳。因为邓小平“要回前方去，只有赶快结婚了，结了婚才好带走”。这样，中央就给他举行了一个结婚仪式。“这个仪式很简单，就在杨家岭毛主席那个窑洞外面的山坡上摆了一些桌子。在那个地方很热闹，小平和卓琳，还有孔原和许明，两对很高兴。虽然仪式很简单，但是到的人都是高层次的。”毛泽东、刘少奇等都来了。周恩来因为去苏联治病而没有到场。

这些高级领导人，难得为前方抗日将士举行婚礼，所以，简

朴的仪式和简单的酒菜也简化不了热闹的气氛。据刘英说：“敬酒敬得一塌糊涂，孔原同志也是高兴了，喝酒喝得很多，最后就醉了。许明就埋怨他，可小平同志一点没醉。”原来是邓发和李富春弄了一瓶白水充作酒水，才使得他们的老友邓小平免于—醉。结婚时，邓小平 35 岁，卓琳 23 岁，几天后，他们就一道启程奔赴前线。此前，这两对新婚夫妇还留下了四个人在窑洞前的幸福合影。

邓小平自从 1939 年结识了终身伴侣卓琳，此后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 58 年，共同经受了政治上的第二次、第三次“落”与“起”的惊涛骇浪。在长达 58 年的共同生活中，邓小平和卓琳这对革命战友、生活伴侣，相濡以沫，共同患难。例如在江西蒙难的岁月中，邓小平无微不至地照顾卓琳，除了尽量多做些重体力家务外，每当卓琳生病、卧床不起时，邓小平总是为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对卓琳付出的辛劳，他也及时地表达敬意，这种习惯直至他完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还仍然保持着。节日里，煮饭烧菜任务往往由卓琳及女儿担当。吃饭时，邓小平总是不忘给卓琳及女儿倒上一杯葡萄酒，并说：“辛苦了，节日的厨师，我来敬你们一杯。”这问候声中，包含着这位伟人对妻子深厚的情谊。

亲临前线指挥磁武涉林战役

1940年3月，一二九师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等地区打击“顽中之顽”的军事行动，是一次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作战，目的是争取时局好转。作战目标以朱怀冰部为主要目标。根据八路军总部意见，刘邓商定：“小平、李达去指挥林武磁涉战役；定（3月）5号开始”。

3月5日凌晨2时，邓小平下令发起战役。顿时，左、中、右3个纵队，各自按照预定路线突击，进展顺利。当日17时，邓小平下达新的命令：中央队向东南突击消灭朱怀冰主力，如其“南窜则追灭之”。左翼队对顽南逃“应特别注意”，右翼队阻敌南窜，“战况立告”。同时，邓小平把战况及时报送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

3月6日，邓小平签发第二号书面命令，指明：“敌已溃退，我决猛烈追击消灭之于漳河以南，林县城、科泉线以北地域。”同时规定了各部追去路线、目标。并强调应注意的策略：“重点仍对朱贼军直及九十四师，对其他中间部队仍取争取态度，不得轻易动武，以致违反我党主张。”命令要求，全军要“不惜一切疲劳完成本任务。”

3月7日、8日，邓小平又电令各部：继续猛追，9日，电告各部：南逃之敌大部为我消灭，你们应“肃清散部，收散兵灭枪，灭地方团队”。战役于9日结束，4天中共歼灭国民党顽固

派反动武装万余人，控制了邯郸至长治公路以南，临淇、西平罗以北地区。巩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百团大战

1940年春，八路军总部设便宴为聂荣臻率晋察冀挺进支队北返送行，邓小平与刘伯承及李达、陈赓、陈锡联等出席作陪。其间，大家谈起华北晋冀豫、晋察冀两战区配合问题，一致认为应当在适当时机对正太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破袭。7月中旬，左权来到一二九师师部，传达了彭德怀关于发起大规模破袭战的设想，刘伯承表示赞同。处事一贯明确果断的邓小平还说：“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22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预备令》，同时上报中央军委。随即，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师前方指挥所召开作战会议，在刘伯承布置好各部队任务后，邓小平又强调了这次战役的有利条件和注意事项。他并要求大家回去把任务向部队交代清楚，进一步做好战斗动员。

8月20日晚20时，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八路军参战部队先后达100多个团，仅一二九师就达46个团。邓小平与刘伯承一起，按照八路军总部的统一安排，指挥部队进行大规模破袭战，取得了显著战果。

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侵略的嚣张气焰。百团大战既锻炼了人民军队，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又在抗日局面比较沉闷时振奋了全国民心。共产党坚持长期敌后抗战和发起百团大战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共产党在抗战中“游而不击”的谬论。

主持温村会议

1943年1月至2月，中共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在河北涉县温村主持召开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并在会上作《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括总结和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报告（1月26日），和《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结论》（2月20日），各分五部分，共约9万字。报告和结论全面系统地总结了1937年至1942年以来，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巩固太行根据地的方针即“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会议认为，这个“进一步巩固根据地的明确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同年底，邓小平主持的中共北方局会议强调：“团结全华北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是1944年全华北的方针”。以温村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为标志，邓小平全面阐发了巩固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里的《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括总结》等五篇文章中。

重任在肩

1944年5月，党中央、毛泽东决策挺进豫西，邓小平作为北方局代理书记，和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滕代远一起，组织实施这一战略决策。7月14日，邓滕急电毛泽东等，报告进军豫西的准备情况，又亲自约见进军豫西支队的正副支队长面商具体事宜。他不仅在政治、军事上给予指导，还专门派人解决支队所需供给、装备。10月5日，邓小平等将挺进至豫西的皮定均、徐子荣所部支队正式定名为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并连续急电军委，将豫西各方面重要情况及时源源不断地上报中央军委。尔后，又先后组织和帮助其他几支部队挺进豫西，特别是还帮助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解决枪支弹药。

此前的1943年10月至1945年6月，彭德怀、刘伯承已离开太行。在这一时期中，邓小平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参与八路军总部的领导工作，独立地领导一个战略区的全面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他在这一时期中，政治、军事、经济、理论等工作多方面地展开。其报告、文章、谈话、电文，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一二九师，由出师时的近万人发展成近30万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地方部队，民兵发展到40万人，共取得歼灭日、伪军42万余人的伟大胜利。晋冀鲁豫区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

区最终连成了一片，全区已控制了 80 多座城市，拥有人口约 2400 万。

军政兼施 上兵伐谋

1945年8月25日，一架美军运输机由延安机场摇摇晃晃地起飞，当日就降落在太行山区黎城县简陋的长宁机场。乘坐者为中国共产党在各战略区的前线高级将领，计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陈赓等20余人。这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在不了解中共意图，不知道乘坐人员身份情况下，为刘邓等提供了飞抵太行的方便。刘邓等匆匆走下飞机，到第一二九师驻地作短暂休息后，很快地奔赴各自指挥岗位。刘邓急返太行山区前线，是为了亲自指挥上党战役。这时，邓小平已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委。

9月10日，刘邓指挥所部发起上党战役，经攻城、围城打援两个阶段，坚决收复阎锡山部抢占的上党地区。蒋介石在重庆一边部署人同中共代表团谈判，一边密示所部：“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昭然若揭。

10月8日至12日，刘邓指挥的追歼逃敌阶段结束，此役，晋冀鲁豫野战军等以3.1万人战胜了3.8万敌人，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促进了“双十协定”的签署。

上党战役的隆隆炮声刚刚停止，平汉战役（也称邯郸战役）

的烽火硝烟又起。1945年10月16日至11月2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周密组织、亲临指挥的平汉战役，争取高树勋率新八军起义进而达到围歼其他之敌，共毙伤敌3000余人，俘敌战区副长官马法五等高级军官以下1.7万余人，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等装备。这是刘邓运用军政兼施、攻心为上谋略取得的一次很有影响的战役胜利。此役是继上党战役后晋冀鲁豫野战军给国民党军队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引起国民党内部很大的震动，它对阻止国民党军队沿平汉路北进，掩护我军调整部署及争取国内和平的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提高警惕 自卫反击

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定签定以后，国共两党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派出执行小组分赴各地执行任务。于是，邓小平同刘伯承一起，又开始同美、蒋代表人员进行艰难的“和谈”斗争。内战全面爆发前，邓小平在邯郸会见了军调小组成员。但他清醒地意识到时局的复杂性。

早在1945年11月，邓小平在邯郸市郊峰峰煤矿主持召开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全体会议时，就对全区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在会上，他严肃地批评了平汉战役胜利后一部分同志思想上存在着的意志松懈、居功自傲和厌战情绪，号召全区军民充分认识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应付长期内战的各种准备。

1946年4月至5月，刘邓联名签发晋冀鲁豫军区《关于准备应付内战的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军事斗争纲领》和《关于应付大规模内战加强准备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区军民提高警惕，利用停战时期抓紧练兵，搞好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

1946年6月，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开始发动全面内战。2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邯郸南郊马头镇举行爱国自卫作战誓师大会，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到会并讲话，号召军民们奋起自卫反击，保卫解放区。

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刘邓率部相继发起了七次战役。陇海战役：1946年8月10日夜至8月22日，历时13天，主要地点为兰封、民权、东明，共毙伤俘敌1.6万人。定陶战役：9月3日夜至9月8日，历时5天，主要地点为大小杨湖，毙伤俘敌1.7万人。此役连同中原突围、苏中大捷、被认为“对于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势的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了。”巨野战役：10月3日夜至10月7日，历时5天，主要地点为张凤集、龙固集，共毙伤俘敌0.5万人。鄄城战役：10月29日晚至10月31日，历时3天，主要地点为鄄城南高魁在，共毙伤俘敌0.9万人。滑县战役：11月18日至11月22日，历时4天5夜，主要地点为朱楼、上官村、邵耳寨，共毙伤俘敌1.2万。巨金鱼战役：1946年2月22日至3月16日，历时24天，主要地点为巨野、金乡、鱼台，歼敌1.6万。豫皖边战役：1月24日至2月底，历时36天，主要地点为丁大庄、兰封、郑庄砦，共歼敌1.6万。

拉开战略进攻序幕

1947年6月30日深夜，刘伯承、邓小平率主力4个纵队共12万人，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从8个渡口，150公里的地段强渡黄河。这种情景虽然和两年后邓小平等领导的渡江战役规模比之为小，但气势也是“很了不起的”。顷刻间，国民党军赖以防守的“黄河战略”即告破碎。蒋介石急忙赶到黄河南岸郑州，调兵遣将，企图迫使刘邓十几万人马背黄河作战。而刘伯承讲：“此时不打，更待何时？”邓小平则借古喻今：“我们绝不去学韩信。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我们只能有一种选择。为着人民利益，我们要生存下去，让敌人去跳黄河！”于是，刘邓指挥部队适时发起了鲁西南战役。

鲁西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之战。虽然国民党军调集了10个整编师、25个半旅、18万余人，又出动战斗机、轰炸机1500余架次，但我军以15个旅兵力，经过28天的连续作战，歼敌四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6万余人，迫使敌人先后从西北、山东、中原等地调集7个整编师、17个半旅驰援鲁西南。从而有力地配合西北和山东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

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8月7日晚，刘邓率所部十几万人以排山倒海之势，开始向国民党军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指战员们跨陇海铁路，渡黄泛区，突破沙河。这一突然的战略之举，如同一柄霍然出鞘的钢刀，直插大别山这一战略腹地。23日，当刘邓率野司和六纵进到汝河北岸时，发现敌先我到达汝河南岸，占领渡口，在飞机配合下截断我军去路。此时，尾追之敌距我军后卫仅30公里。刘伯承一改往日温儒风格，高声说：“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邓小平接着说：“千钧一发啊！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这不去或转回去，就完不成党中央和毛主席赋予的战略任务！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在刘邓亲临河边战场指挥的鼓舞下，指战员们浴血奋战，终于在天亮前突过汝河，从敌人防御阵地中杀开一条通路。为了抢渡过淮河，邓小平提出，由他指挥阻击尾追之敌，李达参谋长指挥渡河，刘伯承先行渡淮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刘伯承说：“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结果，抢渡淮河成功，8月27日，刘邓率军进入大别山区。

1947年8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胜利进入大别山以后，联名下达了指示，指明今后的任务是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全部控制中原。邓小平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

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8月31日，他在河南省光山县北向店，向野战军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作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邓小平深入浅出的报告内容，通俗易懂地讲解，使周围席地而坐的干部们发出会心笑意。他一语中的：我们已到了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把蒋介石逼退了一条线。这是蒋介石战略上的失败。接着，他简明扼要地分析了坚持大别山区斗争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并提出目前的具体任务。“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邓小平最后以有力的手势，结束了报告，指战员们报以热烈掌声。一位记者抓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这珍贵的历史瞬间。

9月，刘邓大军在河南商城、光山两县连打三仗，将国民党军南线机动兵力吸引到大别山北麓，鉴于敌军的分进合击，实行包围，10月，刘邓以两个旅伪装主力留在北麓与敌周旋，以主力7个旅趁机前出鄂东，在敌情严重，供给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发起张家店、高山铺战斗，其中，高山铺战斗共歼敌1.26万余人，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

胸怀全局 勇挑重担

1947年11月底，国民党军队开始对大别山展开全面围攻。为适应反“围剿”需要，1947年12月10日深夜，刘邓两人暂时分开了。邓小平关切地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态度坚决：“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邓小平曾这样向中央军委陈述：我及先念率指挥所在淮河以北，并指挥各纵。李先念是11月27日与刘邓会师的，他生长在大别山区并在此领导过革命斗争。杨国宇曾高兴地说：“李先念对大别山情况最熟悉，我们可以不要地图了。”分兵时，李达参谋长神情严肃地告诉有关人员：“刘邓分开行动，要保密！保密！”

刘邓分兵以后的两个多月，是刘邓大军“反攻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指挥几个纵队，在大别山北麓东西运动，调动迷惑敌人。刘伯承率一部在外线，内外线配合，终于站稳了脚跟，实现了战略任务。

邓小平不仅着眼于全国战局，关切着友邻部队。当粟裕等得知大别山区斗争十分艰难，要支援大别山，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时，邓小平于12月22日提出：大别山局势虽然严峻，但我们已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豫陕鄂和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

严格落实各项政策

1948年的元旦之夜，邓小平是在金寨县漆店区楼房村度过的。他这次到漆店区楼房村，主要是检查解放区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克服出现的“急性病”，如工商政策的落实情况。前一天上午，他了解了贫雇农情况，强调必须建立贫农团，有了这个核心，才能充分发挥贫雇农组织的作用，把根子扎牢、经得起斗争考验。对当地干部汇报“有些中农多余的耕牛可不可以分”的问题，邓小平听得很认真，但未马上回答。李先念表示不能分，并说：“这个问题，只要向贫雇农讲清政策，是很好解决的。”邓小平表示同意这个意见。然后又仔细地询问当地有没有工商业，指示在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把工商业发展起来。夜晚，邓小平等又听取各县县委书记的汇报，并和他们一起收听新华社广播的主要新闻——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2月9日，邓小平提出拟将前指“相机移驻与野后会合，部署作战”。12日，邓小平签发关于主力转出大别山后与华野、陈谢协同作战意见的电报。22日，他又以中原局名义发出《关于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的指示》，在此前后，他又在潢川县双柳树东南的环山主持召开会议，并作全国形势和主力北出后军区部队继续坚持大别山根据地斗争的报告。随后，他们经该县高店、春河集，跨越潢（川）固（始）公路北渡淮河，于24日同刘伯承所率的野后在安徽省临泉韦寨胜利会合。一些

老同志回忆当时的邓小平：“衣着黄旧，又黑又瘦，惟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有的老同志在日记中写：会合后，“白天、黑夜，旧友新朋喜相逢，各叙情长忆东风。前后（指）都遇到许多险境。可是并无增减人员、照样干。”

从豫南到豫西

1948年4月10日，刘邓率部越过平汉线挺进豫西，与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部会合。5月26日，中原局、中原军区等各领导机关分别进入驻地。刘邓率领的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河南省宝丰县北张庄村，位于洛阳至叶县公路以东2公里，村子不大，南依土岭，北邻小溪，环境很幽静。在这个村的东北角，有一所较大的地主家宅院，宅院有东、南、西、北4个院落，刘伯承住东院，邓小平住西院。东西两院之间隔有一条通道，沿着通道往北走出后门，是一片茂密的树林。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流过，炎热的夏天，刘邓和直属队的战士们常常在小河里洗澡，或者在树林里散步。

北张庄村东北面是中原局驻地，南面是政治部驻地，西面是后勤部驻地。很显然，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位居中心。在这里，刘邓先后主持召开了野战军旅以上干部政治工作会议，地点先后是叶县郭店、宝丰县杨岗村、焦楼村、柳林村。历时25天。第二次是团以上干部会议，地点为军区驻地北张庄村，历时3天，主要听陈毅讲述目前形势、任务、政策。第三次是宝丰会议，历时11天。这三次重要会议的召开，对各次战役的胜利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起到了保证作用。

决战前夕

这时，中原军区已经成立，刘伯承为司令员，兼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张际春分别为第一、第二副政委。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邓子恢分别为第二、第三书记。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雪峰、张际春6人为常委。这样，就从党组织领导和军事领导方面保证了中原解放区的各项建设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上述主要领导人工作的分工是：邓小平以极大的精力抓党政工作；刘伯承和陈毅主要抓军事和作战；邓子恢主要抓军区和地方工作。

1948年的淮海决战中，在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同时，11月初，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要迅速攻占宿县。这就把徐州之敌与南面切断了，实际上形成了对徐州的包围。尔后，他们研究了从速夺取宿县、截断徐州、蚌埠间敌人联系问题。11日，下达了徐蚌线作战命令，指挥参战部队连夜向宿县开进。12日，包围宿县县城。毛泽东对此举表示赞赏，认为“甚好”。随后，刘、陈、邓指挥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等，于16日拂晓全歼守敌，攻占宿县。与此同时，四纵等部占领固镇，控制了200里长铁路及沿线两侧地区。

攻歼黄维集团

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中野等在双堆集歼灭黄维兵团，是淮海战役承先启后的关键，是刘伯承、邓小平等争先走出的一步有惊无险、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棋。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理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总前委成立后考虑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确定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以攻打黄维集团为目标。他们认为，黄维兵团骄横胆大，孤军深入。但其远道疲惫，远离后方，开来的3个军7个师中，强的只有3个师。所以，刘、陈、邓在11月14日就向军委和毛泽东提出：如黄继出永城和宿县，我则集中8个纵队，“歼击黄维为上策”。11月19日，邓小平与刘、陈磋商后，接连起草电报致军委和毛泽东并粟裕等，全面陈述敌我双方情况，在知己知彼基础上重申：以六、七个纵队先打黄维、李延年，似为上策。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准。

围歼黄维兵团从11月23日开始，至12月15日胜利结束，历时23昼夜。11月23日至24日为阻击作战阶段。刘、陈、邓指挥中野一部，利用南坪集诱敌深入，然后分别由东西两侧向心突击，结果将敌包围于宿县西南双堆集等地。11月25日至12月2日紧缩包围、准备攻击阶段。开始，黄维奉蒋介石命令不顾一切地以主力向东攻击突围，因廖运周率100师起义和我军顽强阻击而受挫。12月4日至12月15日为阵地歼灭战阶段。刘、陈、

邓精细计算了敌兵力损耗情况后，决定调整作战部署，组成东、西、南三个集团作向心攻击，并起用总预备队华野两个纵队，调华野特种兵纵队一部参战，于6日发起全线总攻。此时中野已伤亡达2万余人，但指战员们愈战愈勇。战至15日，国民党军向西突围，刘陈邓及时调遣部队堵击、追击，当夜全歼黄维兵团。

参加中央九月会议

1948年7月，邓小平奉命北上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简称为九月会议），此时恰好也是三年前他和刘伯承离开延安返回前线之时，此番回到党中央、毛泽东身边，一方面是汇报3年来特别是挺进大别山以后各方面情况，一方面也是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献计献策。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参加了这次自抗战结束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针对国民党力图挽回败局的战略企图，会议为最后打败蒋介石，有条不紊地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从思想、政治、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会议期间，邓小平还和毛泽东等看望了军委二局的工作人员。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夺取全国胜利以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即七届二中全会。邓小平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作了几次发言，主要内容为：一是对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表示完全同意；二是对目前形势分析；三是对全会上提出的城乡问题、战斗队、工作队等问题。四是关于华东管辖范围和人事安排。

根据《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所述，邓小平在会上第一个发言（讨论人事安排时），并谈了部队渡江后新区筹粮、城市筹款、货币使用办法，还着重谈了接管上海的工作。对这些毛泽东表示赞同：“人事配备，现在就这样定，将来有变动再说。”会后，毛泽东又召集邓小平和陈毅等，具体商谈横渡长江作战的问题。

挥师百万渡大江

渡江战役前夕，中央军委决定：渡江作战，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关于渡江作战计划，军委、毛泽东和总前委在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战犹酣时就运筹了。一个月后，刘伯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次渡江是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稳健地集中使用兵力。1949年1月29日，邓小平在河南商丘主持召开中原局扩大会议，也讨论了渡江作战准备的一些问题。2月8日，邓小平在商丘主持由中原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总前委会议，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战勤准备等问题，最后形成《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上报中央军委。3月2日，邓小平在蚌埠以南之孙家圩子，连续主持召开总前委和华东局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进一步讨论渡江南进问题。26日，邓小平、陈毅等又听取了第三野战军各兵团首长关于渡江作战准备情况的汇报，着重研究京沪杭地区战役实施方案。根据大家意见，邓小平还亲自起草了《京沪抗战役实施纲要》。

1949年4月中旬，中央军委鉴于和平谈判已有进展，电示总前委，将渡江时间推迟半月或1个月。邓小平和陈毅等详查当面敌情、水情，根据谈判期限和天候有利条件，于4月17日提出于20日夜全线渡江作战，军委、毛泽东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一气打到底。同时号召全军将士在邓小平

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同心同德，完成渡江南进的伟大的任务。于是，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电报，下达了渡江作战命令。这时，中突击集团准备先期渡江，邓小平等以总前委名义及时指示：“只要有可能就可以这样做。总之，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该先过江，不必等齐。因为全长1000余公里长的战线上完全等齐是不可能的。”

渡江战役第一阶段，4月20日夜，总前委指挥中突击集团首先在贵池至芜湖间突破，拦腰折断敌长江防线。乘其全线动摇，惊慌失措之际，总前委又命令东集团、西集团于21日黄昏，同时在东起江阴、西至马当约600公里宽正面上，有重点地对敌发起攻击，战役发起4小时后，成渡部队就达16个团，控制了长江南岸宽200余里、纵深10至20里的登陆场。

战役第二阶段，西集团二野三个兵团兵分三路，实行平行追击、跟踪追击和超越追击相结合，进军速度加快，追击战果显著。于5月上旬，控制了长达800多里的浙赣线，完全粉碎了敌军在浙赣线实施展开、组织反击的企图。

与此同时，邓小平、陈毅和粟裕等，以指导渡江后的东、中两集团，以钳形攻势迅速对进，首先在郎溪、广德山区合围歼灭敌5个军8万多人。随即又鉴于汤恩伯集团约20万人退集上海，负隅顽抗，不成则从海上撤退的情况，命令三野集中8个军，仍采取钳形攻势，切断敌海上逃路，然后聚而歼之。5月23日夜，总攻上海市区的作战开始，各路部队以“保民何惜血沾衣”的精神，严格执行不使用重武器射击规定，采用机动灵活战术，攻占市区要点。25日，又策动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起义。至27日下午，完全解放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激战16天，以伤亡

2. 4 万人代价，歼灭上海守敌 15 万人。此后，邓小平又以很大精力进行教育接管干部，圆满接管上海的工作。至此，伟大的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1949 年 4 月 27 日深夜，邓小平与陈毅渡过长江后，就住在蒋介石居住多年的南京总统府。6 月进入上海，两家合住在一栋小楼里。

不久，邓小平来到北京，向党中央、毛泽东当面汇报三月份以来的工作。中共领袖和各民主党派人士、爱国团体，正在紧张地筹备着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建立。身为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于 7 月 19 日写信给在上海的华东局主要成员，转达了毛泽东的口头指示。

8 月 4 日，邓小平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作了报告，介绍了从渡江战役到解放上海的情况。例如渡江战役胜利的原因，军事占领后城市接管工作等等。在上海，他大病了一场，头痛得卧床难起，可见征战之辛苦！尽管如此，他还是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 月 1 日，他和毛泽东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数十万军民，和全国人民群众，欢庆着人民革命胜利的伟大节日！

这时，党中央、毛泽东已经把进军大西南的任务给了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

出奇制胜

1949年11月1日，与四野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二野主力发起进军川黔作战。在四野部队的战略配合下，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第五兵团等部，分别由湘西的邵阳、桃源地区出动，以突然迅速的动作，于10日前就挺进至贵州境内，解放了镇远、三穗地区，并直插贵阳、遵义。第三兵团也在刘邓指挥下，会同四野一部，突破了宋希濂部两翼，解放了秀山、酉阳、恩施等城。贺龙也指挥十八兵团等在川北发起攻势。刘邓指挥二野主力等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宽约500公里的地段上向敌实施多路进攻。这些战役行动，完全出乎敌意料，打乱了敌人西南整个防御部署。仓皇之中，川东南之敌企图重新布防，确保川敌主力侧后方安全。而二野各部排除万难，加速猛进，于11月15日解放贵阳，19日，围歼了宋希濂兵团。28日围歼罗广文兵团大部，乘势夺取重庆。12月初，第五兵团主力等已迂回至川南，完全切断了国民党军南逃道路。随即，刘邓贺又指挥所部发起成都战役，27日，全歼成都地区守敌。40年后，邓小平回忆说：“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

1950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组织二野第十八军进军西藏。邓小平说：“进藏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他在起草向中央提交

的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举行和平谈判的十条政策中规定：“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的各种制度维持原状不予变更”，“达赖活佛的地位不予变更。”他十分郑重地说：对西藏这十条，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

但是，通往西藏的和平道路并不平坦，也不笔直，进藏官兵们克服了极大困难，表现出我党我军最大的诚意，但仍被阻挡在昌都大门外。1950年10月19日，进藏部队奉命发起昌都战役，叩开了进藏的大门。第二年春，西藏和谈全权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来到重庆面见邓小平等，一个月后，他在北京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签定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主政西南

1950 年至 1952 年，和刘伯承、贺龙主政大西南，是邓小平在地方工作的最后一个岗位。将近 3 年时间里，他在刚刚获得新生的西南地区做了大量工作。现在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的有：《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这七篇文章从几个侧面反映了邓小平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彰显了他具有的治国安邦的卓越才干。

长期共事 相知甚深

邓小平曾在《悼伯承》一文中说：“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

很多在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将士们曾这样形容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刘邓就是刘邓。这两个字中间，顿点都加不进去。

刘邓亲密无间的战斗友谊连毛泽东也铭记在心，1947年下半年，毛泽东比较早地在电报中称呼刘邓所部是“刘邓大军”，多次称赞刘邓“部署完全正确”，“决心完全正确。”1972年，他在陈毅追悼会上讲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半年多以后，他又批示说，邓小平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的。

1986年10月14日，在北京西郊的一个礼堂里，白花点点，哀乐阵阵。邓小平带领全家人最先来到礼堂，向患难与共长达十三年的老战友刘伯承的遗体告别。鲜花翠柏丛中，刘伯承身上覆

盖着鲜红的党旗，安祥地躺着。邓小平向故去的老战友深深地鞠躬，然后，环绕着遗体，眼睛久久地注视着，渐渐地，泪水模糊了视线。这在不轻易流露情感的邓小平来说，是不多见的。后来，他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两天以后，邓小平又主持了刘伯承同志追悼会。

在《邓小平文选》第一至第三卷的 222 篇文稿中，就有两篇是邓小平为刘伯承而作的。一篇是 1942 年 12 月 15 日载于《新华日报》华北版《特刊》上的《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文章。另一篇就是邓小平在主持追悼会后第五天发表的《悼伯承》（1986 年 10 月 21 日）。

到中央工作之初

1952年7月，邓小平离开了重庆市，前往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同时还兼任着中共西南局、中央组织部、国防委员会等许多部门的职务。

邓小平参与了新中国建立之初一系列重要的国务活动。1952年11月，他代表毛泽东接受了西北、中南地区民族参观团敬献的锦旗，并同他们亲切握手。1954年9月，邓小平和陈云在北京西郊机场，欢迎前来参加建国五周年庆祝活动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此外，他还参加了许多国务院召开的会议。

1953年底，高岗、饶漱石在党内搞分裂活动，邓小平等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后，邓小平客观地讲：“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

为了揭露和挽救高饶，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讨论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后者的座谈会共开了7次，前4次侧重对证饶犯错误的事实，第七次是饶自我批评，会议由邓、陈作了总结发言。随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党中央作了关于饶漱石问题的报告。“高饶事件”使中共在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对团结问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1954年2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形成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第

二年，邓小平又代表党中央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从八大到七千人大会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时刻。此前，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提出设立中共中央总书记，并推荐邓小平担任此职。在随后举行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这一年他52岁。总书记的职务他一当就是10年，后来他说，自己一生中最忙的就是这10年。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苏两党论战。邓小平后来说：在中苏两党的激烈争论中，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的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的确，作为中苏两党间谈判，论战的中方主帅之一，邓小平曾数次率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仅1960年他就去了三次。

1963年，中苏两党间的关系彻底破裂，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回到北京，受到的欢迎是非常隆重的：毛泽东和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到机场迎接。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历史上也称“七千人大会”。邓小平和毛泽东等都参加了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邓小平还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大会对认真总结建国以来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活跃党内民主生活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962年1月召开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全党都十分关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一些地方的农民和基层干部纷纷要求包产到户。邓小平于7月2日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农业问题和7月7日接见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都讲到“猫论”。他说，“生产关系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接着他讲：“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此有针对性地说明了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党的政策。尽管讲后邓小平交待过他的话不要再传达了，但是这句体现他的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格言还是传播开来。而且一传，就把黄猫说成了白猫、花猫了。

在曲折中发展

邓小平说过：“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面，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很值得回忆的。”

邓小平还说：“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

邓小平概括地讲：“‘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

1957年，他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一个方面就是要面对群众的需要。他批评有些领导者，“考虑问题常常忽略了群众的需要。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化那个化，连共产主义文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对于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解决群众需要的问题，甚至有些不花钱也能解决的问题，却注意得不够。我们的建设工作应该面对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邓小平还说过，建国后十七年从干部群众关系看，“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气尚好，广大干部

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

邓小平进一步概括地讲：“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

艰难的抗争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面对危机四伏的紧张局势，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心急如焚，他们去杭州当面请示毛泽东之后，回到北京又成批派出工作组以稳定混乱局势。陈伯达等从中阻挠，邓小平坚决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并当面斥责陈伯达一伙别有用心做法。然而，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听了江青等人诬告，指责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只好违心地作检讨。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在中共中央第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派遣工作组为契机，进行的一场艰难抗争。这是一场同林彪、江青等不要党的领导，制造内乱的反动行径的抗争，也是同不断发展的党内个人崇拜趋向的抗争；是一次艰难而又曲折、复杂而又特殊的抗争。其目的是力求使内乱初起便受到遏制。尽管这场抗争最终未能阻挡“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这毕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于“文革”初期就挺身而出制止内乱的首先之举，它和“二月抗争”等行动一起，为后来纠正“文革”错误，实行全面拨乱反正作了一定准备。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林

彪、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又罗织罪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

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966年11月12日，在首都各界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此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从当时拍摄的照片看，邓小平目光看着讲话稿，显着格外地镇静。

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摇旗呐喊，在北京城区公然进行诬陷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宣传，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神圣的天安门城墙；1967年1月1日，北京20多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8月5日，批斗刘少奇和批斗邓小平、陶铸的会议，分别在中南海内刘、邓、陶各家的庭院里进行。康生的妻子、“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临场指挥，安排录音、拍电影。这几个批斗会与同时在天安门举行的群众集会遥相呼应。尔后，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先是被监管起来，而且一管就是数年。

在南昌“劳动改造”

从1966年9月至1969年10月，邓小平一直被监管在中南海他自己的住宅里。当时，强加于他莫须有的罪名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69年10月，他和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三位老人被安排到江西南昌郊区的“将军楼”，接受“劳动改造”。

1969年11月的一天上午，邓小平夫妇穿好新劳动服，由监管人陪着，迈出步校大门下了坡岗，沿着一条沙土大路，向自己“劳动改造”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走去。

邓小平刚来厂劳动时，被安排擦洗零部件，后来被安排做钳工活，对此他很高兴，马上说：“这个要得，锉刀活可以出汗，我还可以多活几年”。经安排，他来到车间一个角落新工作台前，顺手抄起一把锉刀，熟练地干起来。工人们很惊奇，看着邓小平有板有眼地锉着，心想：工厂里恐怕还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了老邓这几下子呢。嘴上不禁赞叹起来。邓小平笑了笑说：“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当过钳工。我是老钳工哩，不过现在我的眼睛没有那时好。邓小平加工的第一种零件是轮胎螺栓，第二种零件是车厢门板。这两种零件加工、修整的工作量都很大，但邓小平加工得又快又好，竟一时出现了毛坯供应不上而停工待料的事情。这使工人们从心里感到敬佩。

有一天，邓小平来到车间，像往常一样站在工作台前，双手

紧握锉刀，来回地锉着。不一会儿，他突然额头上冒了大粒汗珠，眼前直冒金花，头脑中感到天旋地转，他一下子晕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在车间另一角落里干活的卓琳闻讯赶来，大家七手八脚地将邓小平搀扶到椅子上坐下。这时，工厂领导有事外出，大家围在邓小平身边一时束手无措。还是卓琳有经验。她用手摸摸邓小平的头，看看他的眼睛，告诉“给他冲点白糖水喝就会好一些”。在电工班和卓琳一起干活关系很好的青年女工程红杏忙跑回家中，端来冲得很浓的白糖水。喝过白糖水，邓小平渐渐地清醒过来，脸色也略为好些。随后，陶端缙驾驶拖拉机把邓小平送回了将军楼。

第二次复出

1971 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在江西得知便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1973 年 3 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坚决支持下，恢复了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4 月，在周恩来举行的欢迎外宾宴会上，邓小平首次公开露面。尔后，协助周恩来从事外事活动。此事当时就震动了国内外政坛。

1973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时，按照工作分工，他主管外事工作。此外，王稼祥、乌兰夫等一批久经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也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1974 年 3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部提出的建议：由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由他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但是，江青坚决反对，使得这次会议议而未决。随后，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出席联大会议的人选，江青大闹政治局，把十分严肃的会议搅得很乱。毛泽东在会后得知江青的表现，十分不满，他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这才使江青收敛了器

张气焰。4月6日，周恩来抱病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由于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多数委员也前来送行。机场彩旗飘扬，数千名群众载歌载舞，热烈欢送。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激起了与会会员国的强烈反应，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与会期间，邓小平会见了许多国家代表团团长。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4月19日，邓小平圆满结束了出席特别会议的使命，率团载誉而归。周恩来再次来到首都机场，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再次来到机场。机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热烈迎接邓小平载誉而归。

1974年10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引起了江青一伙的嫉恨。这一年底，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面商全国四届人大各项方案时，又一次地批评了王洪文，并当着他的面高度评价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比你强。”毛泽东关切地告诉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笑了，他明白，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委以重任，他为邓小平顶替自己在第一线主持工作而感到高兴。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7日，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从此邓小平受命主持党政军工作。

进行全面整顿

邓小平受命主持党政军工作后，像当年指挥大战役一样，义无反顾地发起了全面整顿的“战役”。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发出了“军队要整顿”的动员令。认为：总参、总政、总后“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后来，他进一步明确提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问题，要恢复优良传统。他说：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的问题，就是闹派性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性很差。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为了做到这些，我们要加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个大局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同一天，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九号文件。这是邓小平决心以整顿铁路交通为突破口，进而扩大到经济战线的整顿，直至发展为全面的整顿。所以，铁路交通整顿事关全面整顿。邓小平精心选择铁道部新任部长万里担任这一重任，并给了他中央九号文件这把“尚方宝剑”。仅一个多月，铁

路整顿大见成效，至4月底，全国20个铁路局有19个完成了国家计划，月装车量达到53700多辆，整个铁路大动脉“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这是“文革”开始以来铁路战线仅有的好形势。在此前后，钢铁工业的整顿紧跟而上，军队、教育、文艺、科技等领域的整顿也紧锣密鼓，相继展开。真可谓势如张弩，节如发机。

5月间，他连续数次主持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针对当时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作重要讲话。强调一定要使钢铁工业发展起来，必须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鼓励各级领导要敢于抓生产，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还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有关政策。就是在这次会前后，邓小平讲了这番激动人心的话：你们不要怕犯错误，我这个人就犯过错误，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但不要怕。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敢不敢接受中央的支持，敢不敢按中央这次指示的要求去办。从现在起，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到6月30日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七一”派。过一个月后，就不客气了，不等任何人，管他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会议后，中央也马上下发了文件，结果6月份钢铁产量就发生了很大变化。钢的日产量达到72400吨，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1975年9月26日下午，邓小平等8位国务院领导，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的汇报。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期间作了重要插话，他神情严肃地讲：“如果我们的科研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当汇报到第五个问题“红与专”时，邓小平插话说：“现在连红专也

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他列举了数学家陈景润和北京大学一位搞半导体的老科学家专心致志、废寝忘食搞科研的事例，充满着感情说：“广大的科研人员实在是想搞科学研究啊！闹派性的是少数，现在这个状况是能够改变过来的。”“我们要把那些比较好的，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记下来，建立科技人员档案，帮助他们创造条件，不管他们资格老不老。……总之，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家庭有困难的也要帮助解决。”

1975年9月15日上午9时，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拖拉机厂的新厂房内隆重开幕。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陈永贵致开幕词。陈锡联、江青、吴桂贤、姚文元参加了会议，到会代表3700人。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重要报告。明确地提出要全面整顿的思想。

风雨同舟共患难

这时，周恩来的病情进一步加重了，令邓小平分外焦虑。后来，邓小平曾被问及留法人中与谁关系最密切时，他深思后说：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据有人回忆：邓小平在法国负责编辑《赤光》时，“油印博士”的雅号就是周恩来给起的。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邓小平是周恩来的助手，1965年，在一次几位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小型会议上，谈论毛泽东接班人时，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谈到邓小平。认为他可以接替毛泽东“掌舵”。并且，他还评价邓小平是举轻若重。邓小平政治上的第二次磨难时，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江西有关领导，安排他在江西的住处。周恩来特别交待：“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也不能当全劳力了。也是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适当照顾一点。”一年以后，周恩来在庐山上对身边的保健医生说：这里有我的两个熟人，一个是你的同行，“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又过了一年，他当着“四人帮”面说：林彪这伙人就是要将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不符合主席的意思。

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是毛泽东决策，周恩来积极促成的。周恩来曾亲笔在一封信上指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

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提过几次。”还曾亲笔拟定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但是，“四人帮”经常发难，处处设阻，连邓小平“主管外事”的工作他们也妄加干涉。这时，周恩来常常尽其所能帮助邓小平：他明确支持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对“四人帮”以风庆轮事件强迫邓小平表态仗义直言：这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

1975年是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大刀阔斧地主持开展全面整顿工作的一年。2月，周恩来在主持四届人大产生的新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着重宣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9月，他又在会见外宾时对外宣布：“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10月，周恩来在自己身体每况愈下，又准备作大手术前，他特意把邓小平叫到身旁，欣慰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在邓小平第三次遭受磨难之初，重病在身的周恩来还嘱咐身边医护人员代替自己去看望身处险境中的邓小平，代致问候。

痛悼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因病医治无效，于上午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顿时，日月失辉，草木含悲。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周恩来在上午病逝世后，中央政治局很快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为周恩来治丧的问题，商定了请示报告、讣告、治丧委员会名单等问题。邓小平心情十分沉重，给毛泽东写报告。对邓小平写来的报告，毛泽东表示同意。

周恩来病逝的消息公布以后，举国哀悼，世界痛惜，纷纷要来中国参加悼念活动。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由邓小平等立即约见准备前来的国家的驻华大使，请他们国家的代表不要来京，1月9日下午，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上述情况，并将治丧委员会的正式公告送审。

1月12日，由邓小平宣读的追悼周恩来大会的悼词起草出来了，经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审定，打好清样，送给毛泽东，请其审阅批示。毛泽东圈阅表示同意。

但是，“四人帮”阻挠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在叶剑英的支持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追悼大会。当人们从电视荧光屏和无线电广播中看（听）到邓小平（及他的声音）时，为他担忧的心情减轻了不少。然而，这也是他第二次被迫离开政坛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第三次“沉落”与复出

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仍不断地造谣中伤，经过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确定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理总理，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第一号文件，通知全党。同时停止了邓小平担负的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改为“专管外事”。此后，中央又连续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即“批邓打招呼会”。几天后，“四人帮”又提出邓小平、叶剑英在1975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有错误，“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在“批邓打招呼会议”，传达了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讲话。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代表中央提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从此，在全国掀起了对邓小平的批判。3月2日，江青在私自召集的12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大骂邓小平。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更

有甚者，“四人帮”大喊大叫坚持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只是由于毛泽东没有同意才作罢。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上述决议是根据错误判断而作出的错误决议。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胜利》的社论，错误地提出“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刘少奇一起镇压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旦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便旧病复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些显然都是不辨是非的不实之词。

邓小平被“打倒”了。这是他的第三次“沉落”。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关切着蒙受不白之冤的邓小平。他们在呼唤着：邓小平，你在哪里？！

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步履维艰。本来，1976年的10月，取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全国各族人民欢庆胜利之际，不由地渴望着党中央能够及时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一是请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二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种心愿反映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叶剑英提出的两条意见中：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评价，应该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他还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关心邓小平的身体健康，解决其阅读中央文件，改善处境等问题。后来，叶剑英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功绩。他说“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深刻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

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做了书面发言。提出：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此外，聂荣臻、王震等老同志也提出了同样的强烈要求。

1977年7月21日的北京，灯火辉煌的会议大厅里，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代表们兴高采烈，他们将手一齐高高举起，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使邓小平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全部恢复。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称赞着邓小平！同时人们都在思考着三个字：为什么？！就是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邓小平这样讲：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一个星期以后，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这次亮相比较4年前在国宴上的那次露面显得轻松，数万名群众报以暴风雨般的热列掌声。邓小平恢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以后，在指导和推动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坚决反对“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认为，要维护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否定毛泽东生前作出的任何决定和意见。这种错误思想集中地体现在1977年2月7日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两报一刊社论中的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时就率先起来反对“两个凡是”。4月7日，他对当时的一位中央负责人讲：“两个凡是”不行！4月10日，他又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封信于4个星期后被中共中央转发。随后，他又对前来看望他的汪东兴等讲这个问题。他说：“毛主席画了圈的，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毛主席也画了圈，但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和肯定天安门事件的问题。”5月24日，他再次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复出前就自告奋勇地要抓教育、科技，甘愿做“后勤部长”。他在反对“两个凡是”方针的同时，表示要坚决推翻教育

战线的“两个估计”。

邓小平在1977年8月8日讲话中公开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工作的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对广大知识分子的估计，应当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在邓小平领导下，1977年底，中国恢复了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全国有570万青年参加了考试，他们中的合格者尽管是而立之年才步入大学校门，但他们心中还是由衷地感谢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的邓小平。

伴随着1978年春天的到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大会。

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随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相继转载。这是在中央领导同志关怀和支持下,经过许多理论工作者的反复推敲、修改的。历时7个月,10易其稿。该文约7000字,共分4个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此文一发表,立即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发表当天晚上,就有电话打到《人民日报》社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指示宣传部门对由文章而引发的大讨论“不表态”、“不介入”,有的同志甚至指责该文是指向毛泽东思想。一时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受到了压制。

5月30日,邓小平对几位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观点,尖锐地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他说: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

向后退”。后来，他又在谭震林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上写了批语：“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错误。”同时，又针对一些人表示不介入这场争论的态度说：“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支持下，从6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表示坚决支持这场大讨论。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重申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认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也是为沸沸扬扬的争论做的正确总结。

1978年3月，第五届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参加了大会，并和代表们共商国家大计。3月2日，作为解放军代表团的代表，他参加了人大会议解放军代表团的小组讨论。在发言中，他着重谈了关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问题。指出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他希望军队的老同志在这方面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同时，他先后到湖南、四川和云南代表团开会的地方看望几省代表。在全国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主席，受到了政协委员们的热烈欢迎。9月，他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合影留念。

在历史的伟大转折中

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了关于为薄一波等61人和陶铸、彭德怀等冤假错案平反，以及批判康生等6个问题，邓小平很快就表明自己完全赞同的态度。他首先就1959年确定的那起错案说起。11月27日，他会见美国专栏作家时说：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开。他有错误，但功绩还是比错误多。当日晚，他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插话说，彭德怀也应该四六开。两天后，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又重申了这个说法。对康生的错误，邓小平话虽不多，却很明确。认为他是发动“文革”运动的错误纲领的“组织者之一”，紧接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他为党和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决定对康生进行审查。对陶铸的冤案，邓小平批示：陶铸同志他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间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在随即召开的追悼会上，邓小平和陈云分别为彭德怀和陶铸致了悼词。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解放思

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坚决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会议指出：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满意的。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并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平反，也是邓小平所力主的。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悼词中说：“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邓小平讲：“‘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党中央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他在会上对刘少奇夫人说：是好事，是胜利……

刘少奇生命垂危时留给世人的一句名言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邓小平的话简明地道出了人民必将胜利的历史逻辑。在

此前后的两年中，邓小平参加了 13 次这样的追悼会，为 51 位含冤逝世的同志敬献了花圈。全国有 300 多万干部的冤假错案在 1979 年到 1982 年期间得到了平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1980年8月21日，人民大会堂。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来到邓小平身边，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尖锐问题。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邓小平回答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邓小平与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是分两次进行的，时间分别为8月21日、8月23日，都是在上午长达数小时。

在第二次交谈中，邓小平主要介绍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形势及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但是，仍然涉及到毛泽东。8月28日，意大利报纸发表了这次访谈的内容，世界各国报刊也纷纷转载、评论：“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中国领导人讲解今后党的路线的轮廓是极为例外的。”1985年，即这次访谈后的5年后，邓小平对来访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纳塔提及了他同女记者的这次交锋，他讲：“她问了许多难回答的问题，我总算通过了考试。”随后，邓小平又找中央警卫局的同志交谈。他们把邓小平同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并组织大家讨论，干部、战士们都觉得这样讲

好，能够接受。

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针对讨论中出现的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极端意见，邓小平觉得必须予以澄清。10月25日，他召集胡耀邦以及负责起草决议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明确地阐述自己对这些极端意见的看法。他对这几位同志说：“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紧接着，他肯定地讲道：“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邓小平看着在座的几位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其实，从决议起草工作一开始，邓小平就反复强调：阐述毛泽东思想这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在此，邓小平重申：这“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他缓和了一下气氛，说：“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但是，“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

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这番话确实道出了邓小平的心里话，给大家以很大启示。

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关于决议中对毛泽东评价问题，他先用提问的语气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建国20多年中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

随后，他用论断式的语言说：“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等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负责。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召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意见。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看完送审的决议修改稿后，又召集起草小组负责同志告诉他们：“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他肯定建国头七年的成绩，以及“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主要成绩，嘱咐“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并表示赞成决议稿写出后要多听听老干部们的意见。

邓小平认为陈云等人意见很好，遂于3月26日又召集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把陈云的意见转告了起草小组。并说：“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为了修改好决议稿，邓小平紧紧抓住这项工作不放。的确，自决议草稿产生那天起已经历时一年多了，其间经过了多次修改，特别是1980年10月组织4000人进行讨论，提出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见。1981年4至5月，又由40多位同志进行讨论、修改，起草决议的20多位同志也下了番苦功夫，终于拿出了一个

好的稿子。

邓小平觉得，这次修改稿是根据开始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合乎三项要求。缺点是长了一点，有两万八千字。实际上，多三五千字也没有关系。他指出，修改工作不能等，要抓紧。邓小平设想，再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个人花点时间和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些，改得更好一些，之后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并在纪念建党60周年时公布。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预备会期间，邓小平于22日的讲话中仍然强调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他严肃地告诉大家：“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6月29日，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195名中央委员，114名候补中央委员及列席会议的53人，耳闻目睹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的情景。

全会认为：这个《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 1977 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他就讲：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

1988 年 9 月 5 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科学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9 月 12 日，他在听取国内经济情况时又说：“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早在 50 年代，邓小平就十分重视科学教育工作。1952 年 9 月，他刚刚调到中央工作不久，就在政务院一次讨论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会议上指出：现在从毛主席起都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科学研究是一项基本建设，在这方面的投资就叫基本建设的投资。1956 年，邓小平刚进入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久，就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接见了参加拟定全国长期科学规划会议的科学家；1958 年 8 月，邓小平和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一道会见

了国防科学技术部门的研究人员。

直到晚年，邓小平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科技事业，他在1992年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1963年1月，邓小平和刘少奇、董必武等会见李四光、严济慈、钱学森等全国100多位科学家；1964年8月，邓小平和毛泽东、彭真一起接见出席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科学家；1964年10月16日，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十多年后，邓小平站在把握国际战略大势的高度总结道：“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在“文革”中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邓小平就和当时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会见了来华的一些美籍科学家。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各条战线的优秀科学技术工作者，技术革新的能手、模范，科技干部，他们兴高采烈，欢庆“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邓小平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他指出：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他认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针对“四人帮”的种种谬论，他尖锐地指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

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1977年5月邓小平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提出的。十年后，他又亲笔题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应该说，邓小平非常重视人才，特别是科学、教育方面的人才。

1974年，毛泽东同周恩来交谈，毛泽东当着王洪文的面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3年后，邓小平讲：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天才论”，但不是反对尊重人才。他对我评价时就讲过“人才难得”。扪心自问，这个评价过高。“但这句话也说明人才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是尊重人才的。”

1957年，邓小平去苏联，苏联政府的官员告诉他，苏联的原子弹，就是三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搞出来的。18年后，邓小平还不无遗憾地讲：“这样的人我们就没有啊?!”

必须大力发展高科技

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说过：“没有小平先生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而现在不光是‘一席之地’，在这个领域里，全世界公认，中国是第一。”

1984年10月7日，邓小平来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试验室建筑工地，奠基典礼举行之前，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工程模型，听取了关于对撞机性能和用途的汇报，并对李政道先生在工程论证过程中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感谢。然后，他又参观了这个研究所的质子加速器。在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为基石培上了第一锹土。洁白的大理石基石上，铭刻着邓小平书写的铭文：“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

在工地现场，邓小平还接见了中美双方参加中美高能物理第五次联合委员会会议的全体成员、中国科学院的一些专家和参加这项工程的各有关单位代表，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对撞机的开工建设是我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国家的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之一。它不仅表示我国高能物理研究基地的建设进入了新阶段，也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正在向着新的高峰发展。建成后，使我国进入世界高能实验和同步辐射应用研究的先进行列。

开工之日，邓小平握着李政道先生的手，饶有兴致地俯视着

对撞机工程模型。当他听到工程将于1988年竣工时，高兴地表示：“祝工程如期完工”。

1988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建造成功了！邓小平又一次来到这里，见到李政道，他笑着说：“感谢你为这个工程做了许多工作。”接着又和李政道先生参观了对撞机实验室，一同前来的还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

邓小平在表示祝贺的讲话中，重提了这件事：“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接着，邓小平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在科技领域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后，说了一番富有远见的话：“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但是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最后，邓小平满怀希望地说：“总之，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在科技工作者中间

人们都记得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70年代，陈景润的生活条件很艰苦，科研条件极差。是邓小平了解到他的情况后，亲自过问给予补助。指示有关部门给予照顾。他讲，关于科研，“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中央表扬这样的人，对他们应该爱护和赞扬。”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仍旧想着陈景润的事情。1978年4月，邓小平接见出席全国科学大会代表时，来到陈景润身边，和他亲切握手。陈景润结婚了，爱人叫由昆。1983年，他们有了自己的小孩，但陈景润却面临着缺少住房、夫妻分居两地、工作上缺乏助手等三个困难。邓小平得知上述情况，又明确指示，解决这三个问题。1988年，陈景润患病住院，邓小平又为他解决了照顾他的亲属在北京入户问题。陈景润的妻子感激地说：“没有他老人家，就没有景润以后的安定生活，就没有我们这个家。”

邓小平认为，我们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走到工厂，走到地方，到处都受欢迎，到处都请他们谈战略，谈远景，谈规划。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科技专家在我们国家里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已经同过去大大不同了。他们的工作做得越好，越有成绩，就会使全国人民越加懂得知识的可贵，推动大家都来尊重知识，

学习知识，掌握知识。所以，他非常关心科技人员的各方面情况。

1978 年 4 月，邓小平、聂荣臻等接见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1980 年 2 月，新春佳节之际，邓小平来到首都教师春节联欢会上，同教师们畅谈，互祝春节好。1984 年 2 月，邓小平来到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看望师生员工们。1987 年 8 月，邓小平亲切会见在“四化”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年科学技术专家。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邓小平这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来自于1986年4月19日他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王宽诚、霍英东、李兆基等人时的谈话。4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篇谈话的简要内容，其中就有这句话。他曾坚决地表示：“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

的确，邓小平对我国教育工作不仅高度重视，而且是落在实处。仅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他就有三篇文章论述教育问题。这一时期，他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总书记。

在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文章中和在未收入《邓小平文选》的一些报告、谈话、文章中，邓小平也对教育工作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

—1951年1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西南局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党要过问学校教育工作。“领导机关一定要建立对于学校教育的领导”。

—1954年4月8日，邓小平在政务院第212次政务会议讨论中学教育工作时讲话：注意中学的纪律教育，使他们“从小养成守纪律的习惯。”

—1955年9月28日，邓小平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鼓励青年“善于把远大的理想和日常的工作结合起来，成为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继承人。”

—1961年10月23日，邓小平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讲话，提出，“我们要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1963年3月，邓小平为《广西革命回忆录》题词：“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各级党委要真正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同志谈话：对好的小学教员，“要提高他们的工资”，“工资可以评为特级。”4月，他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时指出，教育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须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提出：“要建立学位制度，也要搞学术和技术职称。”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认为部队要从制度上考虑，从排长起，“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训练。”“指挥现代化战争需要多方面的知识”。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在四川访问途中对客人说：“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

教育事业。”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在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中说：“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我说的是包括职工教育在内的智力开发，要更好地注意这个问题。”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讲：“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他们是愿意帮助我们工作的。”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后，又作了即席讲话。他说：“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话：“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

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

1987年1月13日，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时坦然地讲：“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这就不能对他们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

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讲：“文革”带坏了一代人，所以，“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教育要三个面向

1983年9月7日，北京景山学校成立20周年之际，该校领导写信给邓小平请他题词。10月1日，邓小平挥毫欣然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是邓小平思考已久的问题，这是在拨乱反正工作基本完成，教育事业开始进入正常运行轨道的关键时期，他对全国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提出的战略部署，是我国教育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前，邓小平为北京育才学校题词：“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

1989年10月10日，邓小平题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1987年3月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共和国总统姆维尼时说：我们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以便进行改革和建设。“要用这个道理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这就是最近我们处理学生闹事的原则和方法。”

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说：“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理

想，守纪律。”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谈了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认为这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强调：“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1989年3月4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

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1984年2月的一天，邓小平来到上海展览中心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会上，他刚一进门，就看到两个年龄不大的学生在计算机操作台前。于是，他走过去，饶有兴致地观看两个“计算机娃娃”的计算机程序设计操作表演。

“娃娃”不断按动着键盘，电脑屏幕上立刻闪现出“欢迎！”的中英文字样，接着又出现了一个造型生动、有趣的机器人，闪烁着一双灵活的大眼睛，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看着娃娃们的操作表演，邓小平高兴地笑了。他面带笑容，亲切地问其中的一个孩子：“多大了？”“13岁”。邓小平和蔼地摸着孩子的头，转过身来对大家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这个“计算机娃娃”如今已经将近30岁了，正在美国的实验室里做研究工作。1997年2月得知邓小平不幸逝世的消息，他在太平洋彼岸满怀深情地说：我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鼓励下才走上了研究电子工作专业的道路，要不是他倡导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不会有今天，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许多学生记得邓小平来到他们中间看望他们的情景。1957年11月，邓小平随同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来到使馆，接见在苏联莫斯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1960年，邓小平和李富春来到吉林省考察，在四平市四马路小学，他与小学生们交谈，询

问他（她）们的学习情况。

1979年7月，邓小平来到安徽黄山，登山途中，他为闻讯赶来的杭州大学的学生签名留念，并与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合影留念。

邓小平主张：“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质，要从小开始培养。”1980年5月26日，他书赠《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

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职务后，协助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召开解决军队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受到全军指战员的欢迎。

1980年3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长篇讲话，他将“消肿”同改革军队体制、培养新人联系起来，特别是同军队服从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的战略问题联系起来。此时，他的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思想观点已经系统化。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军队精简整编工作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为了保证军队生气勃勃，充满活力，邓小平主张军队要建立并实行军官服役、退役制度，使军队干部知道自己什么年龄退休，“不实行退休制度不行”。

他又提出建设强大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搞些合成军、合成师。经邓小平批准，人民解放军整编了若干个集团军，新组建了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等部队，同时加强了特种兵建设。海、空军中也加强了诸兵种的合成，人民解放军真正步入了现代化的轨道。

1978年7月17日，邓小平会见英国詹金森爵士，在会谈中，他结合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根据目前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搞人民战争不是不要军队现代化”。

为了使对方明确人民战争思想与国防现代化的关系，邓小平详细向客人解释说：我们的战略是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人民战争，过去是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现在是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搞人民战争并不是不要军队现代化。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提出要建立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提出军队的现代化。现在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就包括国防现代化，就是毛主席的思想。“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时期，毛主席就说我们要搞原子弹，这不是现代化？我们现在还是坚持人民战争。我们不会去侵略人家。敌人要打进来，中国的‘三结合’就会叫敌人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979年1月18日，邓小平听取三机部负责同志汇报时强调：现代战争要取得制空权。他对汇报的三机部负责同志说：将来打起仗来，没有空军是不行的，没有制空权是不行的。陆军需要空军掩护、支援，海军没有空军的掩护也不行，我们主要的是近海作战。没有制空权，敌人的飞机可以横行无阻。不管如何，今后作战，陆海空军，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强调制空权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但必须要有获得制空权的途径。这就需要加强科学研究。

邓小平指出：加强科学研究，这是总的趋势，不仅是航空工业。不搞科研，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引进外国大型科研设备，同外国科研机构合作搞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好。引进设备要考虑周到，要配套、搞全，同时要要和我们的制造结合起来。还可以派人出国，进行技术培训。可以减少一些现在生产的飞机产量，把剩余的钱用来搞科研，搞新产品试制，搞出中国式的更好更新的东西。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如果我们能

有一定数量的更高级的飞机，那形势就不一样了。”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对海军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邓小平很清楚，新中国建立初期，海军就建立了，而且抽调了相当多二野的干部们到海军中去工作。开始一段还不错。后来，林彪把李作鹏放到海军，开始出现了灾难，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海军真是“多灾多难”。“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指示要把海军搞好，要把海军搞大一点，要加强，有力量才行。虽然抓了海军工作，但是还不够理想。1978年，邓小平对海军“将了一军”，提出海军应当像空军一样搞三查，即查斗志、查纪律、查工作学习。在邓小平看来，海军并不是太太平平，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很顺当，同空军过去一样，也是问题成堆。但只要抓得好，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还是在7月29日的这次讲话中，邓小平面向海军常委们，微笑地说：你们也要有一个章程，起码80%顶用吧。不从这方面着手，国家浪费，而且把风气搞坏了。舰艇在航率这么低，这个作风就很不好，讲作风首先是讲这个。他接着说：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我们不像霸权主义那样到处伸手。我们建设海军基本上是防御，面临霸权主义的强大海军，没有适当力量也不行，这个力量要顶用。我们不需要太多，但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当然，实现现代化还要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现有的东西要搞好，起码要好好修理一下。有些舰艇要配套。有的潜艇我是没有看过，听说很漂亮。只看表面不行，要看实战能力。

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出席了一次内部的军事理论研讨会。他说：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

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战争肯定是持久的，一定要搞持久战，中国有这个条件。在这次研讨会上，有的同志提出要研究我们军队的组成问题，如把一个军组成一个合成军，有炮，有坦克，有导弹，炮包括防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集团军，战时这就是预备队，使用于突击方面。邓小平觉得这样的意见值得考虑。他说：在一个地区首先搞一两个集团军作基础，就可以进行合成军的训练，免得战时临时组成，指挥员都不会指挥。而练兵时也可以接触坦克，接触对空武器，接触导弹，这样就有了现代化作战的知识，我们军队的素质就可以提高。像这样的军队组成或者部分组成问题，要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研究。总之，平时要同战时结合。接着，他又讲了缩减军队问题。

1981年，77岁的邓小平竭力推荐胡耀帮担任中共中央主席，而他自己，最终服从了党的决定，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实际上，按照1980年11至1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前，邓小平就主持了中央军委的工作。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7年11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至1989年坚决辞去这一职务，他在中央军委主席的岗位上工作了8年。

1981年9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此前，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参加这次演习和受阅的，有我军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有炮兵、装甲兵、工程

兵等技术兵种，还有空军航空兵和空降兵部队等等。这次演习，组织周密，准备充分，诸军兵种密切协同，“红”、“蓝”两军对阵“激战”，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演习充分显示了我军指战员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和战斗作风，严格的组织纪律，出色的指挥艺术和熟练的战术技术素养，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

演习结束后，一身戎装的邓小平乘一辆红旗牌敞篷轿车，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随后，向受检阅的陆海空三军讲话，他说“这次演习，检验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这对全军的建设、战备和训练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早在1978年3月2日，邓小平就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小组会上讲话：国防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离开这三化就谈不上国防现代化。抓科学技术，教育很重要。7月17日，他又讲，“搞人民战争不是不要军队现代化。”

1978年5月13日，邓小平与总参谋部领导同志谈话，强调我们要逐步实现指挥系统的现代化。他说：我们搞指挥系统现代化，从自己落后的方面去看看人家的，找一找差距，很有必要。与有些国家军队现代化指挥系统比，我们要落后得多。打起仗来和过去一样光靠电话行吗？天上的通讯卫星这些东西，可不要小看。

他还曾提到美国的一个资料，说使用电子计算机，美国军队开始不接受、不赞成，说是不懂，掌握不了。后来，美国政府下

了很大的决心去搞，现在装备到团以下，陆、海、空军都用上了。邓小平用此例说明：要解决军队现代化是很费劲的，但思想要统一，要逐步实现指挥系统的现代化，总不要拖得太久吧！自己不行，可以引进外国的新技术。当然，主要的技术他们不一定会给，但有些东西弄点回来还是可能的。

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一队队新式武器首次亮相，邓小平高兴地检阅着部队。24个机械化方队，沿着宽阔的长安街开过来。马达声震天动地，气贯长虹。反坦克导弹，火箭布雷车，装甲运输车，新式坦克，自行火炮，岸舰导弹，潜艇和地空导弹，中、远程导弹和战略火箭，……这些第一次公之于众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全部是我国设计和制造的，这充分显示了我军空前强大的阵容。

隆隆的战车声尚未远去，天空中突然传来震耳的呼啸声。只见94架轰炸机、强击机和歼击机组成的飞行编队，呼啸着掠过天安门城楼的上空，使天安门检阅台上的人们仰目而视。

邓小平也抬头望去，他用手遮着阳光，边看边向别人指点着，议论着。飞机编队已远去，他还在望着，想着。

1980年3月，邓小平提出要恢复1955年开始实行，1965年又被中止的军衔制。随后，军队统率机关在8年内召开了有4万人次参加的上千次座谈会，将《军官军衔条例》先后修改了20余稿。可见，邓小平在恢复军衔制问题上积极而又慎重。

1988年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8月1日，人民解放军中恢复了军衔制。9月14日，中央军委隆重举行授予解放军上将军官军衔仪式，洪学智等17位军委委员和三总部、陆海空三军

的高级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仪式结束后，身穿中山服的军委主席邓小平，来到列队等候的一身戎装的上将们面前，热情地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说：我祝贺你们。上将们则向邓小平敬礼致意。随后，邓小平和上将们合影留念。此举令军内外振奋、世界瞩目。外国记者认为，这是在多年裁减人员、紧缩预算后采取的一项战斗部队现代化和提高士气的运动。中国将军戴上肩章，“标志着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新纪元”。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1977年8月23日，邓小平出席军委座谈会并讲了话。他提出“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邓小平认为，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个方针具体化，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方面是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部队要加强政治教育，加强纪律性，要从勤学苦练当中学本领。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也要从苦练当中恢复和培养起来。军队要能打仗，靠提高政治觉悟，靠勤学苦练。不苦练不仅不能提高本领，还会出事故。从战士到干部都要苦练。……部队训练还包括现代化战争知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内容。”几个月后，邓小平又着重强调说：军队非讲纪律不行，纪律松弛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军队，历来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自觉遵守革命纪律。

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提出战士要“一兵多能”，“要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

1983年，邓小平为军事博物馆举办的“培养两用人才展览”题词：“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据此，全军各部队都把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列入正式的教育训练计划，普遍建立起系统的、多层次的两用人才教育网。

1984年，邓小平讲：军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工作真正做好了，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就容易了。“军队培养了不少有

专业技术的人才，把其中一些人才转到地方各行各业去，对地方也是个支援。”他评价说：“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并称赞近年培养两用人才工作“做得不错，有成绩”。

百万大裁军

1984年10月1日，在国庆35周年之际，邓小平登上检阅车，检阅战功卓著、八面威风的人民解放军，虽然他没有穿军装，但军事统帅姿容仍深深地留在指战员们的记忆中。10月1日的这次阅兵式，是新中国创建以来最大的一次阅兵式。人们知道，这不是一次单纯的阅兵式，而是检阅几年来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思想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在迈向现代化、正规化进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此时，广大的指战员们，面对着自己的统帅，想得很多，很远……

从1977年至1984年，邓小平在参与主持和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就我国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现代化，提出了一整套的方针。除上述工作外，还有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精简军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等等。这些方针的贯彻实施，使我国军队和国防建设事业在现代化进程中前进了一大步。1984年国庆大阅兵的成功即是一次很好的体现。

1984年11月1日，即国庆大阅兵的一个月以后，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座谈会。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司令员、政委，聚集到京西宾馆。座谈会一开始，邓小平首先从部队高级干部老龄化问题入手，接着他分析国内外形势，讲明了这次裁军百万的重要意义，他说：“我想谈一谈顾全大局的问题。这个大局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大局。”“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

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我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他解释为什么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裁军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接着，他又重申了军队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问题。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仅用两年的时间，就顺利地实施了这一百万大裁军的战略决策。

改革的突破口

邓小平经过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民说，没有邓小平，中国的改革搞不起来。而邓小平则说，农村改革，这个发明权是农民。安徽和四川走在前列。最先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安徽农村，农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来到农村进行调查。

1978年12月16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悄悄地实行了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结果，1979年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但是，此举却受到了批评。陈云知道此事后，对包干到户表示双手赞成。邓小平认为，在这件事上不要争论，就这么干下去，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小岗村农民包干到户的事公开以后，立刻引来了各方面的议论，有赞成的，有反对的，相当一部分人观望。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肯定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对于一些同志中存在的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的担心，他讲：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最后他指出：“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指示精神逐级传达下去，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4个月以后，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形成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会议纪要》出台了，提出要支持群众包产到户的要求，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从此，农村改革由局部试验进入到全面推广阶级。

农村改革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的繁荣。1980年5月，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农村改革的重要意义。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郑重地肯定了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的改革行动，改革由此全面铺开。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生产队达到93%，其中，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10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正式取消。

四川是邓小平的家乡，改革进程如何，也牵动着邓小平的心。

早在 1975 年他听说四川粮食生产困难时，就指示解决这个问题。1980 年，邓小平来到四川农村进行调查。

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

1984年，人民公社体制被彻底废除，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统分结合的农业经济新体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温饱问题初步得到解决，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迅速成为国家的重要经济产业。对此，邓小平非常高兴，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最大收获。对于这场被称之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邓小平这样总结道：“改革，从农村开始，一度议论纷纷。经过三年，解决了许多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取得成效，认识也比较一致了。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1984年10月，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酝酿成熟。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全面展开、持续高速发展的新阶段。不久，党中央又先后作出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并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同美国、加拿大学者会谈时，针对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他讲：“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结论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里，邓小平首次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党中央在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

“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冲破了以往将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截然对立的传统观念。因此，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

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理论指导有了，那么在实践中怎样将长期由计划经济管理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邓小平到了鞍钢和工人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尔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扬子集团、珠海生化制药厂等林林总总的老、中、青企业，都在走向市场的进程中得到了发展。上海的资本市场、证券交易所、生产资料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在积极培育的过程中，都得到了邓小平的关心。1986年，上海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刚刚上市的新中国的第一份股票，就是邓小平赠送给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的特殊礼物。社会主义能不能用证券、股市？他的观点是：“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他看到，在阻碍中国改革的诸种因素中，由计划与市场问题引发的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议始终存在，并且严重地束缚人们的思想。于是，他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过程中，发表了重要谈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个月后，他在视察首都钢铁公司时，告诉人们要用市场经济的观念换脑筋。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1979年到1992年的13年中，邓小平多次谈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一次比一次深刻。江泽民同志高度评价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他讲：“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共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思路，决定不再提以计划经济为主了，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机制，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同时，这次大会还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划和长期目标。中国的改革事业既面临着光明的前景，又遭遇了最为艰苦的攻坚阶段的特别艰难。

在平息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罕见的政治风波之后，人们又一次地思考着改革开放如何进行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1989年6月9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邓小平坐在椭圆形的会议桌前。他面前没有讲稿，就是那么条理清晰、语句简明地讲：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

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说到今后，他态度非常坚决：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人们面前展现的是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风范：“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

对外政策两个战略性转变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德国的领导人讲：“这一论断是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天才概括方式之一。”“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因素是相互关联着的。世界上，如果没有足够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和平；另一方面，如果世界上的和平得不到保障，那么就不会有明智的发展。战争只能带来痛苦、贫困和残废。”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指导我国外交政策发生了第一个重要转变。

第二个重要转变，是改变了以往实行的“一条线”的战略。70年代以来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我们主张建立从日本到欧洲直至美国的一条线。邓小平讲：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

邓小平的外交生涯大致始于1938年7月他与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的会面，虽然当时无法像今天这样拍照、记录，但是，这次会面也的确被美国客人记录了下来，并写进了《中国的双星》一书中。此后，在抗战胜利后，同美、蒋军事小组的谈判中，他又一次站在了外事工作前沿。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上

调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进入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后，他仍以很大精力参与了外交工作。值得说明的是，他在“文革”中第二次复出时分管的主要工作是外事。第三次被打倒前的几个月中，他又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为“只管外事”。第三次复出以后，他逐渐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但是他仍以高龄出国访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邓小平在指导我国对外政策实行重大转变前后，还身体力行连续出访，为实施广泛外交，打开僵局而不懈努力着。1978年，邓小平74岁，他接连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同时，他也会见了一批又一批来访的外国首脑、国际友人。正是在他主持的这些外交活动中，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从而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制定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7天以后，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整个美国因为邓小平的来访引起了轰动，三大全国电视网的黄金时间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人们看到：新闻记者蜂拥跟踪采访报道；议员们手持以邓小平肖像为封面的《时代》周刊排队请他签名；他头戴赠送给他的仔帽，全场掌声雷动。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了他陪同邓小平等观看精彩表演后的情景：当邓小平“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一支中国歌曲的儿童时，确实全场激动。他吻了许多小演员，许多观众流下了眼泪”。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看过邓小平访

美的电视报道后说：我感到中国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此后，美国各界特别是新闻界一直关注着邓小平。《成功》杂志选他为1985年的成功者，《世界报》在1988年评选他为10年来最代表时代精神的名人。《时代》周刊曾经两度把邓小平评为新闻人物。

冷静观察沉着应付

1989年春夏之交，一场罕见的政治风波在中国首都北京愈演愈烈。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采取行动来“制裁”中国。7月，西方七国首脑在巴黎召开会议，中美关系降到了建交1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时，邓小平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

结果，美国方面于1989年10月和12月，相继派出了前总统尼克松和布什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来到了中国，坐到了邓小平的身边。邓小平严肃地对尼克松说：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民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还有一个国格。他对总统特使说的是：“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他还在会见其他外宾时说，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中美关系最终以美国等西方国家自动解除对中国的“制裁”而告终。

关于国内形势，邓小平自1989年6月以来至9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纵论国内外各种形势，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同时，国际时局变化莫测，国内外各种力量都看着社会主义中国。邓小平满怀信心地对来访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夫妇说：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国庆之夜，他和江泽民等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焰火。

情注祖国统一

怎样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特别是台湾、香港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认为，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他在1978年11月会见一位美国记者时谈到：对于台湾问题，我的想法是可以实行两种制度，让台湾成为地方政府，可以保留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可说是他后来提出的“一国两制”的雏形。正式地使用“一国两制”的提法，是在三年以后。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邓小平也在同一天召开的全国政协座谈会上，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问题，提到了具体的工作日程上来。就在这一天，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停止了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同年9月，邓小平听取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爱国者的范围是很宽广的，包括蒋经国在内，只要台湾回归祖国，他就做了爱国的事。现在最大的统战问题是实现祖国统一。作为在莫斯科一道学习的同学，身在台湾的蒋经国看到了邓小平从海峡彼岸伸出来的言和之手。邓小平真诚地表示：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要多接触，增进了解。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

欢迎他们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我们讲话算数，不搞小动作。”

1983年6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的大学教授杨力宇，详细地谈了大陆和台湾统一的六条设想，即台湾的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军队独立；大陆不派军政人员驻台；台湾的党政军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给台湾留出名额。这就是海内外广为传颂的“邓六条”。他说：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但万万不可以让外国插手。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1985年6月，他来到“大陆与台湾”学术研究会的海内外学者中间，向关心祖国统一的学者们祝贺这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随后，他介绍了国内形势，并且回答了海外学者提出的问题。到了1988年、1989年，他更是惦念着祖国统一这件大事。曾数次动情地说：“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一九九七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一九九七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会见了旅居海外的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部分成员和内地的荣氏亲属。他说：“你们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他认为，中国将来发展起来，中国将更加强大，对世界和平就更加有利。1990年9月，他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说，中华民族子孙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一国两制”构想

1982年9月24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迎接了充满自信和坚定的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双方握手互致问候。

坐定寒暄几句之后，邓小平首先把话题转到香港问题上。撒切尔夫人的长篇开场白强调历史上英国同清政府签定的三个条约仍旧有效，符合国际法，十多年后，她公开了自己当时的想法：“我们要商谈顺利交接，协助一手建立成功的殖民地、出色金融生产中心的香港人和中方磋商，让资本主义香港可继续行使我们的法律。”目的“是以香港岛的主权，交换英国继续管制香港”。

邓小平的话言简意明，他把我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概括为三个主要观点。即：主权；1997年以前15年过渡阶段；1997年以后以什么样的管理方式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说：“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邓小平语调变得轻松一些，解释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他强调：“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

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面对撒切尔夫人在谈话中的强硬态度，邓小平针锋相对地说：“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他直率地告诉对方：“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果过渡时期内香港局势发生严重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了当月18日双方达成的协议，12月19日下午5时30分，中英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字。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了签字仪式。之后，邓小平满面春风，向在现场观礼的香港各界人士频频招手致意。1985年4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中英联合声明。5月，中英双方互换批准书，联合声明正式生效。可以说，这是“一国两制”构想的一曲壮丽凯歌。

当时的签字仪式上，撒切尔夫人发表演说，称赞中国领导人“对谈判采取了高瞻远瞩的态度”，赞扬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答案”。她还说，会谈成功的奥秘就是“一国两制”的构想。对此，邓小平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当时的签字仪式上，撒切尔夫人强调，我保证，英国政府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协议成功。邓小平则庄重地对撒切尔夫人坦言：“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

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邓小平还讲：香港回归以后还要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这“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

邓小平对香港同胞非常信任。每当涉及香港问题，他总是首先在与香港同胞的会面中商谈。从1979年开始，他亲自出面与一批又一批的香港同胞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发表许多重要意见。正是通过这样大量的调查研究，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同时，他指出必须要“港人治港”。1984年6月，邓小平连续两次分批会见了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针对一些人“没有信心”的论点，邓小平讲：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要有这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10月，他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又说：“由香港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当然，参与者应当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他生动形象地比喻说：“我们也不出如来神掌，让香港的中国同胞们自己管理自己吧”。正是在这次会见中，他面对众多的港澳同胞讲述了自己的心愿：“我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随着年龄的递增，他的这种愿望也就愈加强烈。表达的次数就越多。

澳门问题达成谅解

和香港隔海相望的澳门，自古以来也是中国领土。连葡萄牙宪法中也明确表示，澳门是中国领土。香港问题的解决，为中国和葡萄牙两国之间解决澳门问题奠定了基础。

1985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葡萄牙总统拉马略·埃亚内斯时说：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

葡萄牙前首相平塔席尔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表示很感兴趣，明确表示葡萄牙1999年12月20日结束对澳门的统治管辖。1987年4月，邓小平出席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并与前来出席签字仪式的葡萄牙总理举杯庆贺。1988年1月，两国政府互换文本，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邓小平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工作也非常重视，多次会见起草委员会的委员，称赞他们工作中的成绩。

1990年2月17日，邓小平又会见了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即席讲话。他说：“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

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

从小康达到中等国家发展水平

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了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当对方问起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含义时，邓小平的回答非常坦率，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看到对方对“小康之家”名词似乎不懂，邓小平又接着说：“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

实际上，邓小平的回答不是一时的应急之作，而是他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各种情况提出来的。从1978年10月开始，他就多次出国访问，了解国外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

他去上海、山东、天津等地进行考察，其结果是，他告诉国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从而指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难和希望。邓小平进一步地讲：“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现在全国人口有9亿，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他反复强调：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

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为此，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

提出小康标准后，邓小平继续用改革开放的事实来加以说明。作为战略家，邓小平考虑的不仅仅是10年、20年内的事情，他的目光放得更远。在提出小康目标的七年后，邓小平又提出了我国到21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要三步走的战略目标，“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然后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再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是按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这个非常具体的奋斗目标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得到了全党的确认。1987年5月，他在谈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时说，这一目标比较实际，当然困难也很大，要靠我们的努力。后来，邓小平讲，我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

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

1978年10月，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提出：要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他坦诚地讲：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贡献，但长期停滞，发展缓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因此，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把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邓小平强调，这样做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前后，他在一系列出访发达国家期间，都注意了解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日本，他参观并乘坐日产汽车公司汽车。在美国，他参观“波音747”飞机装配厂，在马来西亚橡胶研究所实验站，他亲自割胶。

1978年，邓小平访问了日本，他认真地考察了日本的工业发展状况，并发表了即席讲话表示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坐在新干线的特快列车里，邓小平说：“很快，就像风一样快，新干线推着我们跑，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邓小平在日本参观期间还指出：我们要善于学习，要以现在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他在出席酒会祝酒时说：我们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同时还要努力学习和借鉴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先进经验，以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实现毛主席

和周总理的遗愿，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

邓小平十分关心外籍科学家，经常抽出时间来会见他们征求他们对发展我国经济的各种意见。1979年1月30日，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在华盛顿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宇夫妇会面以后，又会见了另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籍物理学家丁肇中；1983年6月，他会见出席北京科技政策讨论会的外籍科技专家；1983年11月，他向中国籍美国人、医学家马海德祝贺他在华工作半个世纪。1987年5月16日，又会见并宴请了美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远哲和李政道。1989年9月，他又会见了李政道夫妇。

关心文体事业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他在讲话中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争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他曾多次接见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鼓励。

邓小平强调：“必须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在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里，杰出的文艺家实在太少了。这种状况与我们的时代很不相称。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而且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他希望文艺工作者，“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邓小平不仅力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而且还经常观看文艺工作者的演出。1984年9月28日晚，他同首都群众一起观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后，同演员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1974年3月，他接见乒乓球运动员时，鼓励他们：“不要怕输，输了也没有关系，好好训练，主要是鼓足劲。”同年他鼓励

我国出征亚运会的运动员说：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最主要的是要轻装上阵。邓小平十分重视群众性的体育运动。1978年11月他访问泰国时，恰逢第一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曼谷举行。他亲自为荣获男子单打冠军的运动员颁奖。在1979年9月举行的全国第四届运动会上，他不仅亲临赛场，还亲自为获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发奖，表示祝贺。

80年代中期的一次中日围棋擂台赛，一开始中方战绩不理想，战至只剩主帅一人。邓小平对仅剩的一人讲：“你是哀兵，哀兵必胜。”中方主帅冷静应战，连连夺关斩将，终于取得了胜利。

和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在一起

邓小平一生中，对少数民族问题特别关心和重视。50年代初他主政西南时，就为做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特别是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调到中央工作以后，更加关注这方面情况。他始终主张：实现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平等，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帮助西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他经常接见少数民族代表，给他们以鼓励。1981年8月视察新疆时，他观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歌舞团演出，之后与演员们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1982年5月1日，邓小平又会见来京的边疆少数民族青年参观团全体成员。

1980年8月26日，邓小平约见班禅到自己家中叙谈。他关切地询问了班禅大师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真诚地称赞他。说：“我约你到家里谈，不是把你当外人”，“以后可以再来”。此后，邓小平一直关心着班禅大师的情况，并给予支持、照顾，并对他寄以厚望，说：“你不仅对西藏有影响，对其他藏区有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希望你对祖国多作一些贡献。”

创办经济特区和建立经济 技术开发区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创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关于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他集中集体智慧的结果。1978年4月，国家有关部门联合组成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赴香港、澳门，探求两地经济飞速发展之奥秘。归来后所写的考察报告，提出了要借鉴港澳经验，逐步将广东宝安、珠海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一年后即1979年4月，邓小平根据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同志提出的意见，果断地提出：“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不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是一道激荡人心的战斗动员令！

党中央、国务院派出工作组赴广东、福建，同两省一起研究办特区的具体问题。1979年6月，两省的报告写出后上报中央。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两省的报告。1980年3月，中央将

拟名的出口特区正式定名为“深圳特区”。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规定，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4个月后，又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面积为2.5平方公里。深圳等经济特区诞生了，邓小平希望“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作为我国经济特区的主要创建人，邓小平在经济特区诞生的4年后专门来到特区，要亲眼看一看特区的创办情况。深圳原来只是一个只有两万人口的边陲小镇，由于中央给了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所以深圳划为特区后，建立以吸收利用外资为主，经济所有制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结构，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对外商投资给予优惠和方便，由于有了这样的政策，由于来到特区的四面八方建设者的艰辛开拓，几年之间，深圳便神奇般地发展起来，有人称之为“斯芬克司之谜”。

深圳人更加急切地期待着邓小平的声音，终于，他在广州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题词的时间由1984年2月1日提前写为1月26日，这正是他离开深圳之日。

被有的人称为“第一次南巡”的1984年1月至2月的南方之行，邓小平说话不多，在深圳他甚至没有讲出自己究竟是什么印象。但在珠海他却表了态。据当时陪同他的中共珠海市委书记回忆，邓小平说：尽管认识不一致，但短短这几年，珠海能够打开这个建设的局面，不是简单的，我很感兴趣，非常振奋。并且他还亲笔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

在厦门，他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紧接着又为上海宝钢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尽管在视察特区时邓小平说得不多，但回到北京以后谈感受时，他的讲话就多了。1984年2月24日，他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常委说，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有了点感性认识，今天谈谈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

对深圳，他讲：“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对厦门，他讲，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

邓小平概括道：“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从南部沿海几个重要地区的发展需要出发，邓小平认为除已划出的4个经济特区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作为战略家，他不仅看到南部沿海港口城市地区，还考虑到北部沿海“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

特区的某些政策。”

总之，“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政策，大家要考虑。”

原广东省的海南设省，整个海南岛为海南岛经济特区，这无疑是加快海南发展步伐的强大动力。不过，因为一度把开发权转让给外国人而引起的海南“洋浦风波”，一时内则沸沸扬扬，街谈巷议。邓小平听取了关于开发洋浦的汇报后说：海南省委关于开发洋浦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因为他20多年前去过海南岛，对那里丰富的自然资源记忆犹新。

根据邓小平1984年1月至2月谈话的精神，党中央于同年4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北至大连、南至北海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5月中旬，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个建议。有的同志讲：邓小平的这次南方之行是他的第一次南巡，结果，不但肯定了我们的特区政策，我们的改革开放，广东、福建的改革开放，而且，引起第一次我国沿海开放的高潮。

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批转的《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指出，要把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经济开放区。沿海开放区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促进本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带动内地。而形成这个纪要的座谈会就是根据邓小平等人的意见召开的。

1986年8月19日至21日，邓小平来到天津市视察指导工作。他听取了天津市负责同志的汇报后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8

月20日，他来到天津市红桥区咸阳北路居民小区，兴致勃勃地说：“我这次来天津，要看看你们的开发区，看看市容，还要到港口看一看。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在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他还说：“建设居民小区，人民群众有了好的环境，看到了变化，就有信心，就高兴，事情也就好办了。”视察过程中，看到天真活泼的孩子们，他高兴地亲吻他们。

8月20日，邓小平视察了新修的天津中环线，并与天津蝶式立交桥设计人员握手。他高兴地说：“中环线搞得这么快，是不是搞了承包？就是要搞改革，搞承包，分段、分级承包，实行责任制。中山门蝶式立交桥的设计者干得好，破格批准他为工程师，应该，这是谁也不应反对的，这也叫改革。”随后，他又进一步讲：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要讲政治，外国人就是不理解后面这一条。你们经常搞义务劳动，这也是政治嘛。

1986年8月21日，邓小平又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题了词：“开发区大有希望”。他在李瑞环等陪同下视察了天津港集装箱码头。他说：“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你们这里有些基础设施比上海好，有些事情办起来可能容易些。这时，他想起了访问日本时的情景。他接着又说：“要研究投资方向问题，日本人说搞现代化要从交通、通讯上入手，我看有道理。我们在这方面老是舍不得花钱。”他又说：“天津港下放两年来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益

就上来了。无非是给了他们权，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人权。”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东部地区具有加快经济发展和首先富裕起来的优势，国际投资也向该地区倾斜。邓小平正是考虑到这种“国内各个地区的特点”，提出首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然后“再去帮助差的地区，就比较容易了”。“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实践证明，这也是正确的决策。

邓小平非常关注祖国的经济建设。他不仅在视察的地方详细了解情况，即便是在视察旅途中，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同当地负责同志交谈，了解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1988年2月，他在济南车站同山东负责同志谈话，1990年2月，他又同山东负责同志在济南车站谈话。1992年他在武昌、南昌，都是抓紧在车站休息的短暂时间，听汇报谈意见。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6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领导拨乱反正的进程中，邓小平不仅同“左”倾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而且也同右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例如，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他认为：“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他在根据叶剑英建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强调，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81 年 7 月 17 日，他批评了思想战线上存在的软弱涣散状况。1985 年 5 月至 6 月间，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

1986 年 9 月 28 日，邓小平出席了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全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有的同志主张不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进决议。邓小平坚决地表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因为自由化实际上是要把我们中国的现行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他还说：看来反对

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1987年3月3日，针对一些人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他提出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6月9日，在平息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以后，他又指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1992年初，他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更加明确地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这是邓小平1992年1月视察深圳时讲的话。

从主张改革开放之时，邓小平就提出要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对日益猖獗的经济领域里的犯罪，他主张必须严厉打击。否则，“没有这一手，就没有制约。”不久，他又特地指示公安部门负责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这是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同时，他还指明打击犯罪活动的长期性，认为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后来，他又讲：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还有，他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等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邓小平“两手抓”的战略。应当说，这一战略具体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80年代我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突破是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邓小平在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正是他于1982年专门派人前往莫斯科商谈，在坚持原则前提下，争取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不久，中苏两国政府互派特使，围绕着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举行了长达6年，一共12轮的磋商。终于，以中国外交部长访苏为标志，两国长期对峙的关系开始解冻。在此前后，两国的贸易、科技等往来有所增加，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有所恢复。这时，82岁的邓小平为了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感人的话：“我老早就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是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一个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会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结果，随着中苏两国高级官员的互访和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障碍的逐渐消除，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到中国。这是自1959年以来的30多年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邓小平向客人讲起了20多年前的中苏论战，他认为，当时的争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接着，邓小平向对方讲了两

点：一是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近 20 年来，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

他平静地告诉戈尔巴乔夫：“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邓小平建议：“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握手，在宴会上双方又共同举起酒杯。邓小平提议：“为了我们两国和两党关系正常化，祝贺这个正常化，请大家干杯。”

这是一个战略安排

长期以来，邓小平一直致力于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不仅是殚精竭虑，而且是身体力行。

1985 年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前夕，邓小平更加重视培养“第三梯队”。他说，为什么要开这次党代表会议，主要是选拔一批年轻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后继有人，这是一个战略安排。使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更年轻化一些，这是党代会的“真正目的”。如果只有讨论第七个五年计划议题，不开这次党代会也可以。我们要建立第三梯队，以后还要建立第四梯队、第五梯队，从而保证我们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

1985 年 9 月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选举了很多年轻领导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从而使党中央领导机构在年轻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一大步。但是，邓小平认为党中央领导机构年轻化并不是这一次就止步了，以后还要继续走下去。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会议上，要求新老干部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提拔年轻领导干部，又要注意在根本问题上提醒他们，帮助他们。

1986 年 12 月军委扩大会议期间，邓小平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他看到这些年富力强的同志提拔上来了，高兴地说：“好啊，年轻化了。”

1982年召开中共十二大时，选举产生邓小平为主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成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当然，这是一种过渡，最根本的是建立退休制度，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邓小平认为，尽管十二大解决了领导干部新老交替，但党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还是年龄偏大。召开十三大时尚需五年，而培养和锻炼中央领导集体新成员又刻不容缓。所以，邓小平等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建议党中央在十二大到十三大期间召开一次全国党代表会议，再挑一批年轻领导干部，充实到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来，加快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步伐。

带头建立退休制度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进行了一番不同寻常的谈话。内容主要是商量自己退休的时间和方式。他态度坚决地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是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关于退的方式，邓小平已经同杨尚昆谈过，就是“越简单越好。不要形成个惯例，对退的人都歌功颂德一番，那实在没有必要”。经过反复考虑，邓小平认为“简化可能比较有利，而且从我开始简化更有利，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关于辞去的职务交代，邓小平郑重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当天，邓小平还给中央政治局写信，并且“恳切希望中央批准”。

11月9日，十三届五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终于接受了邓小平的辞职请求。他高兴地来到同志们中间，激动地表示：“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中共中央总书记，继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把邓小平送出会场，临别时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12日，邓小平和江泽民接见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

1981年6月，77岁的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直至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他担任这个职

务有8年的时间。这8年中，邓小平虽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得心应手地指挥震惊中外的大决战，但是却领导着在“文革”中遭受创伤的人民解放军迈上了正规化、现代化的道路。

1989年11月12日，邓小平会见了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作了“离职演说”。他确信，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他希望这支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

他感到欣慰地说：“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

邓小平用充满希望的神情望着与会人员，然后缓慢地说：“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全面体现了邓小平关于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这是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在晚年为党的事业做出的伟大历史性贡献。

1989年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刚一建立，邓小平就提出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他希望每个成员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要有意识的维护”江泽民同志。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因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他曾讲，这是我的政治交代。

邓小平不仅提议江泽民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而且又致

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着重向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提议：“江泽民同志任党中央军委主席”。他在离职前简短的讲话中强调：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领导下努力工作。他多次称赞江泽民同志，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表示放心。称赞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持全面工作后，一直坚持正确路线，各项工作干得不错，给国内外以稳妥、平静的感觉，得到了人民信赖和国际上的信任，成绩不可低估。他相信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完全有能力把事情办好，即使有差错，自己经过总结，取得了经验，又前进了一步。

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邓小平深邃的目光在祖国漫长的海岸线由南向北移动着，然后，久久地注视在上海市这座英雄的城市上面。从1920年他第一次来到上海算起，他多次来到上海。70多年中，他经常关心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在他的晚年，从1988年到1994年，竟接连在这里度过了7个春节。那因为是他非常关心上海的经济发展。

1989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在年初邓小平就反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不能乱。一月至二月，他视察了上海。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过后的第一个春节，他又来到上海，尽管是新春佳节之际，他还是特别关心上海市浦东开发这件事。他说：上海的浦东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浦东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所以是全国的事。他还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于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两个多月后，党中央、国务院定下了开发、开放浦东战略决策，并宣布了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就是浦东开发。从此，上海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1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讲：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浦东如果像深圳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现在就要做起。他殷切地希望上海人民，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有人试第一，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2年春节，邓小平视察南方以后来到上海，他向上海市提出了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要求。结果，当年上海市利用外资就超过了前几年的总和。1993年春节，邓小平又在上海提出了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设想。他说上海要带动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1993年12月，邓小平来到上海，第一天就要看杨浦大桥。随后，他视察了上海浦东，并登上杨浦大桥、眺望热气腾腾的浦东建设景象，还视察了建成不久的内环线浦东段及罗山路、龙阳路两座立交桥。他高兴地说：“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对上海两个文明建设的情况，邓小平也十分关心。他还说：“上海的工作做得很好，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在上海过春节，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外地过春节。

元旦之夜，邓小平由上海市党政负责同志陪同，登临上海新锦江大酒店顶层，俯瞰上海夜景。他说：“上海变了！”他还前往人如潮涌的南京路、外滩等地，与上海人民共享节日欢乐。他含笑频频向中外朋友招手致意。

视察南方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南下视察途中在长沙车站作短暂停留。他鼓励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说：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点，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月19日上午，邓小平一行乘专列抵达深圳，广东省深圳市负责同志到车站迎接。下榻在市迎宾馆内的桂园别墅。刚刚进去，他就急切地说：“出去看看吧，一到深圳我就坐不住了！”有关人员立即去安排车辆准备外出。后来，他结束在广东的视察后说：1984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1月20日，在深圳国贸大厦旋转餐厅，邓小平面窗而坐，注视着桌案上的市总体规划图。他提出：判断特区姓“资”还是姓“社”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望着国贸大厦窗外的金融大厦、华联大厦、电子大厦、核电大厦、农垦大厦、航空大厦，邓小平更加兴奋地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1月21日，邓小平还来到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在西藏“布达拉宫”前，他同家人及亲属、陪同的负责同志合影

留念。他不无遗憾地说：全国我就这个地方没有去过。

参观市容过程中，邓小平同各级领导亲切交谈。当谈到创办经济特区时，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地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

1月22日，邓小平来到深圳仙湖植物园参观游览，并亲手种下了一株四季常青的高山榕。几年后，这棵高山榕就树高逾丈，冠盖如盘。他十分重视植树造林，长期以来每年植树节，都要参加植树。如今，北京、厦门等地由他亲手栽种的树林已经长大成材。1月23日上午，就在邓小平准备离开深圳去珠海的前夕，他应服务员的请求，面带慈祥笑容和服务员们合影留念。

1992年1月23日至29日邓小平视察珠海。在驶往珠海的快艇上，邓小平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在珠海期间，邓小平谈起家庭联产承包的改革和经济特区好创办，再次强调要争取时间，抓住机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还从总结经验的角度讲：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

据当时陪同邓小平视察的省委领导同志回忆：对于邓小平前来广东、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是临近春节，所以，主要安排了休息内容。可是邓小平一到达深圳，就急着要了解情况，急着要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变化。“这一点印象很深”。他从到深圳，然后又由深圳坐船到珠海。一路上都在看，出人意料的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讲那么多的话。他不是在一个时间谈，而是边看边谈，“整个过程都谈。”同时，他的谈话不像一般老人的话，“思

维非常敏捷，语言非常准确，深入浅出，很精辟。”

来到珠海亚洲仿真公司，邓小平向随行陪同人员反复强调说：要发展高新技术，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高越新，我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他还热情地鼓励年轻科技人员说，科学的希望在年轻人。他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都回来，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1月24日，邓小平来到珠海生化制药厂视察。当他得知厂总工程师两岁半的儿子与自己是同一天的生日时，非常高兴。看着娃娃那憨态可掬，天真幸福的神态，邓小平伸出双手拥抱他，慈爱之心溢于面容。他还讲，要依靠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要摆脱落后和被人欺负的局面。25日，他登临珠海方圆大厦29层旋转餐厅俯瞰市政建设，远眺澳门景色。27日，参观珠海江海电子有限公司。29日参观设在顺德的广东珠江冰箱厂。

1月30日，邓小平结束视察深圳、珠海后，乘专列途经江西鹰潭车站，江西省主要领导同志到车站欢迎。当他得知江西森林复盖面积比较大时，高兴地说：江西省要坚持把植树造林搞好，要保护好水土，从根本上解决水旱灾害。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时所作的重要谈话，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党中央对这些谈话非常重视。1992年2月，将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以中央2号文件向全党作了传达。3月，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一致认为邓小平的这个谈话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开好党的十四大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这次

会议以后，全国形成一股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热潮。许多领导同志在视察和谈话中也多次强调要学习好邓小平谈话精神。后来，这次谈话经过整理，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为题，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也是三卷本《邓小平文选》的终篇。

倡导全民义务植树

邓小平是全民义务植树的倡导者。1982年11月，他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同年12月26日，他在林业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情况报告上作批示：“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早在1979年3月12日，他在北京大兴县窦各庄参加植树活动，以后几乎每年他都要参加义务植树活动。1983年3月12日，在北京十三陵参加中直机关造林。1985年3月12日，他来到北京天坛公园植树。两年后，他又来到天坛公园植树。

1989年4月2日，邓小平参加义务植树后视察了亚运村工程。1990年7月3日，邓小平视察北京亚运会的体育场馆，他风趣地对周围人说：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1993年10月31日，邓小平乘车游览了北京市容，历时1小时15分钟。他坐在车里，兴致勃勃，车窗外掠过每幢高大建筑物时，他都要仔细询问。他感慨地说：北京大变样了，我都不认得了。随后，他还视察了北京机场高速公路，并在四元桥上稍事停留。

生活情趣

邓小平打桥牌，是进城以后在西南地区工作时学的。从此，打桥牌成了他的终身嗜好。他打桥牌计算精细。1981年，世界桥牌记者协会为表彰他，曾颁发给他桥牌荣誉奖。他常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行，我能打桥牌，说明我脑子还行。”他不仅自己喜欢打，还鼓励老年人也多打桥牌。每次老年人参赛的“运动与健康”，他都亲临赛场。有人回忆：邓小平退休后桥牌水平没有下降。打牌时的慈祥笑容，令人终生难忘。

邓小平能喝酒但不贪杯。他喜欢喝法国的葡萄酒，但更喜欢喝贵州出产的茅台酒。他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有一次和一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团聚，竟接连喝了六杯茅台酒，而且是脸不改色，仍旧谈笑风声。一些老同志还记得：1939年邓小平结婚时，邓小平是有敬酒者来者不拒，而且不醉，原来，是李富春和邓发念在老友情面上，弄了一瓶白水当作酒，才使邓小平免得一醉。

70年代初期，他蒙难在江西，喝茅台酒困难了，他就自己酿米酒。他告诉工人说：“其实，做米酒很简单，也很容易做。先煮糯米饭，加点酒药，放点白糖，再用罐子装起来密封好，过几天就可以吃了。”

邓小平还常常以敬酒方式来表达敬意。节日里，煮饭烧菜任务由妻子卓琳及女儿们承担，吃饭时，他总是不忘给她们敬一杯酒。他在1989年退休当天，大儿子深知父亲的喜好，提出：我

捐献一瓶好酒。

由于医护人员从邓小平的身体健康着想，提议他不喝白酒为好，邓小平又欣然接受，改喝加饭酒，午餐时一小杯，从不过量。

邓小平喜欢抽烟。会见外宾，开始时多次讲到吸烟，都是出于礼貌，或者征求对方自己能否吸烟，或者问对方是否也吸。有一次，他接见外宾时告诉客人：我抽烟了。对方也风趣地说：“我不能对您说不能抽，因为我不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但是在菲律宾，我们内阁开会，不许抽烟。”这使邓小平想起了不久前自己出席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时遇到的一件事，于是他对客人说：“这次人大我违反了一个规则，我习惯地拿起一支烟来，就有一个代表递条子，提出批评，只好马上接受，没有办法。”

邓小平很能吸烟，每天抽两三包。即便是在战争年代，也难以离开香烟。据他的警卫员回忆，行军每到一个新驻地，他总是问：咱们的“小饭锅”怎么样了？他把烟戏称为“小饭锅”。但是，这种特殊的“小饭锅”待遇到大别山区转战时被迫取消了，因为条件非常艰苦，搞不到烟叶。长征途中也是没有烟抽，邓小平和罗荣桓两人就沿路找点破纸、干树叶，用破纸包上树叶当烟抽。邓小平还振振有词：“我是香烟厂制烟的！”尽管他抽烟“历史长”，抽得又多，但是，退休以后医生和家人为了他的健康，劝他少吸烟。于是他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开始戒烟。可想而知，这对于有长期“烟史”的这位老人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最终他还是戒烟了。

游泳，是邓小平锻炼身体的另一种方式。特别喜欢到大海中去游泳，去搏击大海的惊涛海浪。每年，他都要去北戴河或其他

海域去畅游，一游就是一个小时以上。他自己讲：我能游泳，特别喜爱在大海中游泳，这证明我身体行。1989 年那场政治风波的两个多月后，他照例去了海边。游泳归来后他对李政道讲：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活动范围太小，喜欢大自然，自由一些，有个气势。

1992 年，邓小平又来到大海边，一游就是一个小时。他爱大海，爱大自然，整整一个多月，只要能下海，即使水温低，风浪大，他也天天坚持上午游一次。每次尽兴归来，他总要问问周围的医护人员，下水没有下水。得知有的年轻护士说风大没去，他不无遗憾地说：“这么好的水，你们还没去。”

这一年，邓小平共下海 8 次，每次大约 45 分钟，这是他一生最后在大海中游泳，这一年他 88 岁。

在大海中永生

1997年2月19日21时零8分，是一个令人们十分不幸的时刻：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因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高度评价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噩耗传来，万众垂泪，举国同悲。共和国又一次地降下了半旗，人民群众又一次经受了失去自己敬爱领袖的悲痛。

至今为止，我们公开看到邓小平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是1994年10月1日。那是共和国45周岁的生日。当天夜晚，党、国家、军队领导人与首都军民在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晚会。在这个万众欢腾的动情之夜，作为开国元勋，他没有出席庆祝晚会，而是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地方和家人一起观看了北京城上空怒放的焰火。此时，恰恰是他刚刚度过90岁的生日。他身着米黄色服装，欣慰的笑容浮现在脸上。这一幕永久地留在人民记忆中！

伟人逝世，举世震惊。2月20日，联合国总部全天降半旗悼念邓小平逝世。香港、澳门、台湾各地民众表示深切哀悼。大中城市街头的电子广告牌醒目的大字不断报道邓小平逝世的消息。邓小平的遗体于2月24日在北京火化。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等前往医院向邓小平的遗体告别，并护送他的遗体到

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在邓小平同志的灵车驶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路途两旁，肃立着首都和从各地赶来的人民群众十多万人。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和解放军战士，有白发老人、有妇女、孩子。

道路两旁的许多横幅上边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小平走好！”人民群众在寒风中伫立。含泪目送灵车走远、久久不肯离去。他们有人痛哭失声、也有人低声呼唤：车怎么开得这么快，慢点、慢点啊。路途两侧的松柏树枝上，挂满了一朵朵精心制作的白花，表达了人民沉痛哀悼和不尽思念之情。

1997年2月25日上午9时45分，人民大会堂内，全体与会人员起立，神情肃穆地注视着前方。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横幅的下面，厚厚的帷幕沉重地缓慢拉开：只见主席台以银灰色为底色，正中矗立着5米多高、黑色镶框的邓小平同志彩色巨幅遗像，两旁是大型花环，16棵长青树和冬青。邓小平的骨灰盒安放在遗像前的白兰花和常青柏树中，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前面摆放着邓小平夫人卓琳率子女敬献的花圈。6名人民解放军礼兵持枪树立，守护在两旁。主席台两侧摆放着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共中央等送的花圈。10时整李鹏同志宣布：“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开始。”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全场肃立，默哀3分钟。全场立即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之中。默哀后，庄严国歌的雄壮旋律，激荡起每个人心中的豪情、信念。

江泽民同志开始致悼词，他语音沉重，当他含泪带着泣声，讲到极其悲痛地悼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时，陡然间，会场原本悲痛的气氛，更加悲痛不已。人们的头脑刹那间出现了真空，很多人一样，泪水夺眶而出，难以抑止。最后，索性任其流淌。江泽

民总书记侧对着万名代表，不时地用手绢擦着眼镜后面的泪水。人们的心在痛哭，……

致悼词结束后，会场里全体与会者面向邓小平同志遗像深深地三鞠躬。10时58分，在悲壮的《国际歌》声中追悼大会结束。帷幕从两侧缓缓地向中间合拢，只剩下邓小平同志的巨幅画像微笑地面对着人们。帷幕闭上，人们还久久地不愿意离去。

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邓小平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向来达观，关于自己的后事，近年来曾对亲属多有交待：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是毫无保留地把毕生奉献祖国和人民的邓小平的遗愿。现在，他的眼角膜已存放在北京同仁医院的眼库中。

邓小平生前留下了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身后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体现了邓小平一生的追求和信念，完美地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

邓小平一生中与大海结下不解之缘，他迷恋着大海：大海的无限宽广，开阔他博大的胸襟；大海的永恒运动，塑造他敢向时代潮头立的品格；大海的惊涛拍岸，陶冶他处惊不乱的胆略；大海的峰波浪谷，隐喻他三落三起波澜壮阔的一生。

大海呜咽，飞机垂首，邓小平的夫人手捧着洁白的骨灰，久久地才撒下。洁白的骨灰由五彩缤纷的花瓣伴随自低空而落，大海紧紧地拥抱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邓小平。